/違建專題
黃舒楣　康旻杰

/ 城鄉攝影
城鄉攝影大賽評選

/ 教師動態
彭立沛　劉可強

/演講紀實
反迫遷
南鐵東移
陰莖獨白
老T搬家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城鄉通訊

NO.22
DEC 2020
冬季號

▼專題：拆除。迫遷。違建。抗爭。

城鄉『違建』？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城鄉通訊

NO.22
DEC 2020
冬季號

▲防疫隔板，請勿移動。攝：許冠澤。
城鄉攝影大賽・人氣獎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 辦 人｜畢恆達
發 行 人｜陳良治
指導教師｜王志弘
本期主編｜葉庭瑜
文字編輯｜姚麗金　葉庭瑜　楊竣宇　傅　裕
美術設計｜傅　裕
封面照片｜楊伯中
封底照片｜楊伯中
插　　圖｜傅　裕

雜誌投稿｜ntubpnewsletter@gmail.com

編輯室報告

時節大寒，漫長的 2020 年終於也劃下句點，城鄉通訊再次在這冬末春未至的時節與各位相會。

自上期出刊以來，台灣社會發生不少事件，其中南鐵東移案的突襲強拆、以及禮納里永久屋抗爭未果仍遭拆除，都是令人心痛的憾事。本期特別為各位帶來「城鄉『違建』？」專題，以禮納里強拆爭議為核心，編輯部整理爬梳整起事件脈絡，並特別邀請本所黃舒楣老師、康旻杰老師撰文，討論好茶部落拆除背後的結構問題，以及違章建築在都市修補中扮演的角色。

專欄以外，本期也有許多內容與公共性之下的拆除迫遷相關。在演講紀實中，有博班楊宜靜學姊分享華光社區非正規居住的出現與消失，以及吳昀慶學長以自身長期參與的經驗，從南鐵東移案討論鐵路地下化的起源與畸變。而卸任教師動態則延續上期劉可強老師的訪談，繼續請老師深入談論樂生抗爭的經驗，也讓我們看到以公益為名之下，犧牲了多少院民的權益。

現任教師動態部分，則特別邀請到本所三位合聘教師中的彭立沛老師，介紹老師的學思經歷外，也為我們帶來農村規劃的視野。校友洄流則特別訪談了三位陸生，討論在中國大陸與台灣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城鄉所思考脈絡下的規劃又能如何進行。此外還有學生會舉辦兩場性別相關的大師經典講座，分別由本所畢恆達老師分享研究計畫《陰莖獨白》，揭開父權社會為陰莖蒙上的權力面紗；以及東海社會系趙彥寧老師以《老 T 搬家》為題探討同志老年化的課題，以及研究過程中的田野經驗與倫理。最後刊登學生會隆重策劃的攝影比賽《後疫情時代的日常》，經歷所上學生踴躍投稿與三位老師精彩的講評，為各位呈現疫情之下轉變的生活境況。

不論抗爭順利或無果、疫情肆虐或平緩，生活都得繼續。本期通訊很榮幸能刊登諸多精彩內容，編輯在採訪與撰稿過程中也獲得珍貴又易碎的感觸與撫慰，希望能將這些思緒透過文字，傳遞給閱讀的妳。

2021.01.20

城鄉通訊編輯室

目錄

002 編輯室報告

005 專題報導：城鄉『違建』？

006 禮納里好茶部落拆除事件歷史整理

009 黃舒楣：簡談莫拉克災後重建結構性錯誤
引發的原鄉永久屋拆除爭議

013 康旻杰：違建的都市修補

016 演講紀實

016 楊宜靜：迫遷的異識與共識？兼論另類出路之可能

023 吳昀慶：鐵路地下化的起源與畸變

027 畢恆達：陰莖獨白

031 趙彥寧：老年女同志研究——老T搬家

033 教師動態

033 現任教師動態：彭立沛老師專訪

036 卸任教師專訪：劉可強老師專訪下集：
從此，大家都過著快樂生活，嗎？——劉老師談樂生抗爭歷程

▲暴力穿刺。攝：莊詠竹

043 校友洄流

043 芮光曄：堅持初心，參與式規劃設計在中國大陸的砥礪前行

047 陳瑤琳：城鄉所的學習，從離開城鄉所開始

052 張和強：不管在哪種體制下，做規劃的核心理念還是空間正義

057 城鄉攝影大賽

057 後疫情時代的日常
2020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攝影大賽得獎作品收錄

城鄉特別報導

「為什麼不該以違建來討論永久屋基地建築課題？說真的，一本論文都說不清楚。」——黃舒楣

城鄉「違建」？

攝影 吳昀慶

2020 年 10 月，屏東縣瑪家鄉禮納里好茶部落發生令人痛心的強拆事件，在主流媒體上多以「違建」一詞，指稱於 10 月 15 日拆除的部落共享空間。乍看之下，這確實是國有土地上不合法的建築物，網路上也可看到批評好茶部落魯凱族人有了永久屋，還想侵佔國有土地的言論。然而部落居民四十年前來經歷三次搬遷，終於來到禮納里安身立命，為何卻需要這些違建才能維持生計？城市或鄉村中，所謂違建為何而生？政府與法律定義的違建，對居民而言又是何意義？

本期城鄉通訊以禮納里的強拆事件為主題，為各位讀者帶來城鄉『違建』專欄，由編輯整理禮納里歷史，並邀請所上黃舒楣、康旻杰兩位老師，撰稿談論好茶部落拆除背後的結構問題，以及違章建築在都市中扮演的修補角色。

禮納里好茶部落拆除抗爭事件歷史整理

撰文　葉庭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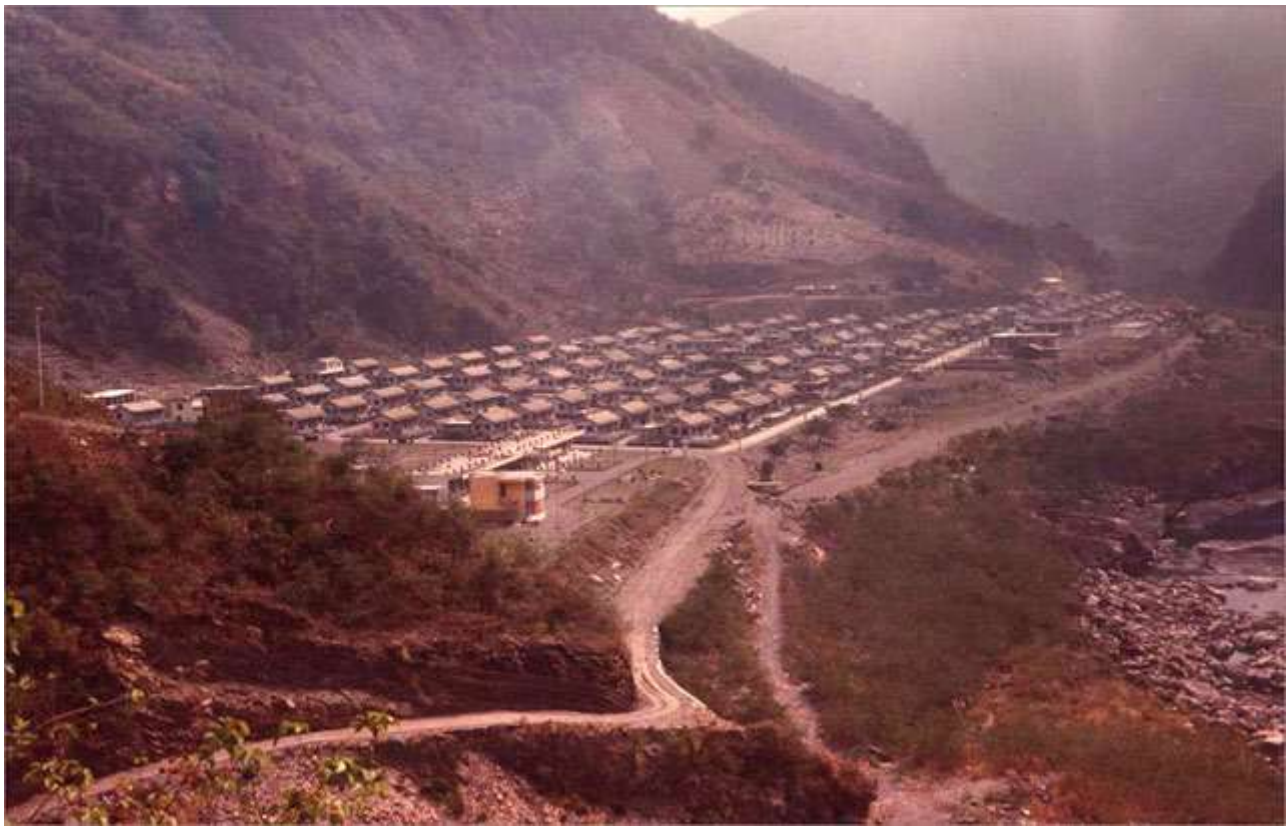
禮納里永久屋位於屏東縣瑪家鄉，原來是瑪家部落傳統領袖家族的領地，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台灣南部山區原鄉受創嚴重，故將排灣族的瑪家（Makazayazaya）部落、大社（Paridrayan[1]）部落，以及魯凱族的好茶（Kucapungane）部落共同遷居至此。禮納里（Rinari）一詞來自於原住民自古以來對這個地方的稱呼，意為「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的地方」，永久屋落成後，三方代表會議共同決定尊重日本時代之前此地屬於瑪家領域傳統之命名，共同生活的新部落自此落成。本次違建強拆的，便是其中好茶部落於空地增建的建築物。

好茶部落舊址位於霧台鄉西南角，隘寮南溪中游北側的山坡上，海拔 900~1000 公尺，雲霧繚繞，相傳為西魯凱族的文化發源地。部落故事流傳，好茶的始祖 Puraruyan 帶著雲豹打獵來到北大武山與霧頭山一帶，雲豹停留在這個風景優美、富有靈性的佳境不肯離開，於是回台東帶領族人來到此地定居，好茶（Kucapungane）便是「美麗的地方」之意，族人也稱自己是雲豹的傳人。1977 年，政府在「山地現代化」政策之下不斷以交通、教育、醫療等誘因勸說，但預定的遷村地海拔僅 230 公尺，氣候濕熱，是好茶人觀念中的 labelabe 之地，並不符合魯凱人自稱 ngudradrekai（住在山上的人）的居住習慣。除了氣候讓人容易生病、不利植物生長，位於河畔的土地易有氾濫之災，且是魯凱族與排灣族的古戰場之外，labelabe 也是好茶認知中野外死亡的靈魂聚集的地方，是惡靈活動的場所，自古便流傳許多血腥與惡靈的故事，過往族人連留宿、開墾都不願意。

然而縱使部落長老持續表達反對，並預言此地不適合居住，未來會發生災難，但最終仍於 1977 年達成共識，族人共同往下遷移，來到位於隘寮南溪河岸北岸的河階地，便是新好茶部落。從下方照片中即可見到，新好茶已然是現代化的棋盤格狀規劃，而非以往山上按照等高線排列的石板家屋，但這塊土地距離舊家園近，腳程快者步行四小時可回舊社，且有親人墓葬於此，長久下來也成為新一代住民懷念的家園。然而其實從日治時代舊好茶開始，一點一滴引入的現代化思想已經慢慢磨損傳統居住習慣，比如禁止室內墓葬、豬舍與廁所也必須獨立於主屋之外，家屋的意義開始慢慢解構。而到了新好茶時耕地減少、引入更多現代化建設，生活型態更是大幅改變，混凝土建造的家和舊社每一棟具有家名、銘記家族歷史的石板家屋，已有很大的差異。

[1] 大社人因家族歷史差異，也自稱 Tavaran（達瓦蘭），為大社部落的發源地，位於 1931 年大社部落的北方。（葉高華，2017）

▼當時被稱為全國第一「山地模範村」的新好茶部落
照片來源：杜良君／轉引自莫拉克88news.ort



搬遷三十年之後，背山面水的新好茶確實也應驗了老一輩的憂慮，接連颱風的肆虐沖毀了家園，終於在 2007 年聖帕颱風後無法繼續居住，暫無居所的族人被安置到屏東麟洛的隘寮安置中心。位於營區的安置中心遠非舒適的家園，附近養豬場的惡臭、狹小的空間，都使住在這裡的族人心無所依。但原以為是暫時性的安置，卻一再拖延，屏東縣政府遲遲無法向台糖收購好茶部落預計遷往的瑪家農場土地。直到 2009 年八八風災，不只新好茶完全淹沒在土石之中，其他原鄉也受災嚴重，才將上述的三個部落一併遷村，成為現在的禮納里。

雖然都是改變居住地，但對不同的部落而言，似乎有著不同意義。如同城鄉所博士生、也是瑪家青年的胡哲豪所寫，瑪家村人認為此次移住計畫更像是擴居而非遷村；而在風災中失去歸去之所的好茶，禮納里永久屋是他們唯一的退路，卻也不是能夠安身立命的家園。整個規劃、營造、搬遷過程的其他問題本文不再贅述，而與本次強拆爭議直接相關的，則是禮納里的土地問題。首先，永久屋的規劃在當時的政治要求下，極為迅速，現代規劃思維下要求的秩序、開發、效率，將整片土地抹除重建，甚至連樹都砍伐殆盡。周邊也沒有留下農耕土地，傳統文化設施的空間也遭到擠壓。過往部落族人以耕作與打獵自給自足，然而禮納里遠離山林，也沒有足夠的空間發展農業，政府看似給了房子，卻掐斷了族人生活所需的來源。

失去與生計所仰賴的自然環境，好茶部落轉往發展觀光，發展出「接待家庭」模式，從脫鞋子、戴花環等進入家屋的儀式開始，接著由族人導覽部落，讓遊客能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也為部落提供部分經濟來源。而這樣的接待家庭便意味著必須從原本便已經不足的家屋中，騰出額外空間讓客人留宿，族人只能選擇往外增建。但因禮納里的土地仍屬國有，部落居民僅有使用權，本次事件中的「脫鞋子部落共享空間」位於永久屋旁的空地，便是被屏東縣政府以「位於公有地、量體過大、營業使用」等理由，用維護公共安全的名號強制拆除。除了土地產權外，永久屋的設計也與魯凱族人生活習慣不甚符合，部落居民們不能耕地、不能打獵、不能過以前那樣的生活，也不能抵押或租售房子，家屋以外的土地也不能按照自己需求彈性使用，又要她們何以為生？而縣政府念茲在茲的，無非就是共享空間的商業行為有營利之虞，然而這卻不是單純的賺觀光財，族人透過復刻過往行儀來實踐部落傳統，在這個規整的異鄉，卻是部落文化得以傳承的難得機會。

當永久屋不符合使用需求，限制了族人的生活，好茶部落卻也不能返回原鄉——不只因為新好茶在莫拉克風災中遭毀、通往舊好茶的路徑隱沒於荒煙蔓草中，更是受困於當初接收永久屋時簽訂的三方契約（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與契約），其中規定取得住宅所有權之後，不得再回原居住地居住或建造房屋，簽訂契約的過程又倉促草率，讓部落族人深感自己是被騙下山。堵死禮納里居民返回原鄉的可能，而法條不鬆綁，也無法讓他們延續傳統耕作、採集、共享部落資源，急就章的安置政策奪走了部落和森林、獵場、河流的聯繫，讓好茶部落進退維谷，千百年來打造出與自然共存、與部族共享的文化正在消失，部落韌性就在這現代化過程中一點一滴摧毀殆盡。僵硬的住宅並非遷居禮納里的族人所想要的，她們心中期待的，卻是政府單向統治視角下無法給予的，真正的家。

本文爬梳好茶部落在歷代政策下的搬遷歷史，以及移住禮納里後的現況，看見所謂「違建」爭議，並不是簡單的正確或錯誤能一言蔽之。更多有關禮納里違建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以及都市違建的討論，請繼續往後閱讀黃舒楣、康旻杰兩位老師的特別邀稿。

▼好茶部落遷移地圖
資料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本文重新繪製

其實不是違建課題

簡談莫拉克災後重建結構性錯誤引發的原鄉永久屋拆除爭議

撰文　黃舒楣

所上通訊編輯群請我寫一篇相關短文來分享於城鄉通訊，實在抱歉拖稿至今難下筆，一方面是問題太複雜難以簡述，一方面是在永久屋基地談「違建」實在是太諷刺，畢竟從島嶼土地來源開始就不知道是以誰為主來討論土地權、合法性和正當性。表面上看來，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管理辦法，未經申請而於從事建築行為即屬違建，這案例還涉及是國有土地上興建，還加上「佔有國有土地」有什麼好談的？若非永久屋違建，引發屏東縣瑪家鄉禮納里好茶村部落族人 10 月間至縣府抗議，甚至引發魯凱族好茶村長老突發潑淋汽油自焚，這事只會被當成是一般違建爭議，完全不會引發媒體關注。[1] 幾個月來，來自高、屏、嘉義、台東超過十處永久屋基地串聯北上發聲，民間團體如小米穗基金會、財團法人社教文化基金會和關心的學者們輪番表述，終於有立委協助召開公聽會，以及後續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召集專案小組的發展。然而，幾個月來從地方政府到中央各部會機關的回應，看來仍讓人失望。撰稿時桌上躺著一份由工程會協助負責政委吳澤成所彙整的各部會回應（2020/12/22），具體顯現重建會解散之後欠缺主責機關綜整，徒有各部會踢球表演的狀況。

為什麼不該以違建來討論永久屋基地建築課題？說真的，一本論文都說不清楚。2009 年八月八日風災造成的嚴重災害和動遷，有許多受災村落在原住民鄉，由國家啟動莫拉克災後重建委員會負責，初期幾年狀況和重要議題有不少相關研究，至少可參考本所幾本完成於 2015 年之前的碩論。[2] 然而多數人誤以為重建會於 2014 年解散，任務已成功完成，殊不知多年來有許多政策制度上造成的根本問題仍在各基地深化矛盾困境。最近這起違建，只是浮現的冰山一角。其中最相關近期爭議的，也正是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特殊性—取消了歷來國際間一般會先有中繼安置處理一至三年左右的居住需求，然後以更長時間來細緻處理重建規劃課題，討論就地重建或異地重建的不同模式。當時為什麼政府會自以為聰明的跳過了中繼安置階段？多數人並不清楚這和八月八日當天的政治公關危機有關，造成了後續一個月內當局愈發想要展現效率和魄力，適逢幾個大型慈善團體積極募款且獻策，慈濟更以自己在東南亞及南亞各地援助經驗，主張一次到位的永久屋，遂成就在台灣獨特的「永久屋」，永久屋基地多達數百戶規模，兩三年內在各地完工。[3]

---

[1] 相關爭議其實自 2020 年六月即開始，本所數位學生去年修習課程時曾隨筆者到現場，當時是拆除標的房屋剛剛落成不久。好茶 2 住戶遭檢舉違建 民以車擋道阻拆除 2020-06-30 IPCF-TITV 原文會 原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SQkgiEc4M

[2] 胡哲豪（2014）禮納里部落災後重建過程中的原住民知識與文化詮釋；李毓青（2012）災後遷村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家園認同之探討－以在禮納里的好茶部落為例；陳慧融（2011）災後應變集體行動與社會資本運作－八八風災高雄甲仙鄉三個社會之經驗

[3]「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性安置住宅計畫」完成 43 處永久屋基地，共 3561 間的永久屋，分布遍及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其中以高屏最多。

然而，「永久」兩字實在是誤導之名，只是相對「中繼」而來的永久，事實上哪有任何人為構造物能永久存續？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援建住宅」，透過簡稱「三方契約」（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與契約書）來有條件地贈與受災家戶。受贈家戶擁有地上物所有權，但不同於一般房屋所有，不得出租也不得轉賣或抵當借貸。永久屋座落土地屬於住宅區，依土地使用規範不得營業。永久屋的房型依當時以戶籍人口分配，2 人以下配住 14 坪、3~5 人配住 28 坪、6~10 人配住 34 坪。若以一房難求的都市水準來看，免費受贈獲得永久屋似乎很不錯，不該再有什麼抱怨，然而這種假設忽略了幾個重要關鍵：第一是三方契約同時要求受贈家戶不得返回原居地居住及建造房屋，這不僅是失去了原鄉房屋，更失去了近便生產活動資源（如耕地）的連結性；第二是災後異地重建已不只是個別安置，而是整個部落異地再發展的長期課題，部落發展的課題又如何能僅依照特定時刻的戶籍人口來估算，而完全沒有考量長期發展成長的複雜需求？三方契約究竟依什麼法源能做此規範，有沒有公法遁入私法之嫌？永久屋繼承效期如何？永久屋居民有沒有可能租用或價購永久屋所在土地甚至將其納入原住民保留地增編？諸多疑慮都沒有釐清，然而重建會解散後中央將永久屋歸由地方政府管理，不知其脈絡的承辦人當成建物管理課題來簡化行政，造成近日的憾事。

近來，先前集眾力關注的繼承時效問題，似乎得到緩解承諾：內政部商請法務部採取新廣義解釋「按當時安置原意係為使災民遠離危險區域，長久居住，安居樂業，故採廣義解釋該永久屋得持續世代繼承」（研商永久屋政策評估相關事宜簡報，工程會技術處 2020/12/22)。法務部也「識相」地下架其行政函釋。看似顧及了「永久屋」之永久形式，然而地上房屋安置所掩飾的原鄉土地關係流失，仍沒有積極回應。同一份簡報其實有行政院交環處表示註記：「除了衡酌第四點及第五點契約原意，在於使丙方及其繼承人（包括後代子孫）能有條件的永久取得建物所有權及土地

▲上圖：2009風災後原來位於隘寮南溪河岸的好茶村僅存長老教會建築可見，其餘全數覆蓋於土石之下。
下圖：2020年十月拆除前的好茶接待家庭共享空間。

▲禮納里永久屋基地照片 (黃舒楣老師提供，2017年科技部計劃團隊拍攝)。

所有權外，亦建議參考三方契約第六點規定，政府限制永久屋居民及其配偶與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不得再返回原居地居住及建造房屋，相對也應該持續保障永久屋居民的土地使用權提供較為合理的解釋基礎。」這段話中仍有多少魔鬼細節要釐清，我們不知能期待多少誠意對應能產生於這個華麗的表演場。

近年來透過國際交流合作，我們知道不少地方反省過往經驗，越發重視以社區本位災後重建規劃」最大的特色，是有多種的選擇，以及因應階段實行狀況而滾動檢討調整的彈性，因而符合不同個人或社區的需求，災民個人可以選擇自己購買土地重建、社區可以選擇利用社區集體土地重建、社區也可以自行購地重建等等，各種方案都有不同的配套措施，透過階段性滾動調整、提供多種選擇的重建規劃，迥異於永久屋採取的一步到位、單一選擇。「社區本位災後重建規劃」另一個特色是兩階段建屋，第一階段是中繼屋，提供災民暫時安置，以緩衝時間來思考後續重建方案 - 中繼屋的執行當然困難，要提供臨時安置又要顧及社區集體意識，充滿各種挑戰，然中繼屋仍是非常重要而不該忽略的步驟，災民需要能夠在合理合適的安置過程中能保持社會關係，以利社區溝通、形成如何重建、是否涉及搬遷的共識。[4] 近年日本於三一一地震及海嘯災後的中繼安置採取更多租金補貼自尋租房安置，看似方便但讓居民不易維繫社群關係、社會資本，反而造成難以整體規劃重建、加速偏鄉人口流失的副作用，需引以艦。欠缺了關鍵的中繼階段，不少茫茫然搬入了永久屋基地的居民是十年過去之後，才回頭過來逐漸領悟，自己失去了什麼，而獲得的禮物其實充滿限制。有不少受贈家戶其實根本不清楚當初簽了什麼合約，直到近日爭議討論才翻找出來檢視。

「其實不需要給我們房子，我們可以自己蓋…」

[4] 以印尼的莫拉比火山週邊社區災後重建來看，個人或社區在中繼屋後選擇異地重建者，政府會選擇離原來村落不遠的地方，提供家戶 36 平方米 (約 10.8 坪) 的房屋，以及 100 平方米 (約 30.2 坪) 的土地，各家戶擁有房屋權和土地權，個別戶多會依家戶需求成長而擴充增建，規劃有預留空間；而通常永久屋基地設立的地方附近都還會有空餘土地，提供社區未來自行蓋屋增加新家戶數的機會。

這句話在不少受災的村落中出現過，言外之意是，更緊要地是土地關係，如果土地權益能確保，原住民其實不想要成為接受贈與而依賴國家、貌似安置定居但充滿限制的受贈援助對象。然而十一年過去，這樣的聲音仍未能為政府積極面對，官僚管制系統仍情願相信近來事件是違建問題，而沒有看見災後重建規劃擘畫及執行本身內涵的層層錯誤，持續造成傷害，甚至是部落內部的撕裂。十二月初接受民視異言堂訪問，最近才播出為《在永久屋想家》[5]。然而十五分鐘特輯實在不夠細說層層問題，還有待更多人長期關注、參與行動。

[5]【民視異言堂】(2020/1/10)《在永久屋想家》https://reurl.cc/NXa82n。

《禮納里好茶部落拆除抗爭事件歷史整理》參考資料

台邦・撒沙勒（2008）〈傳統領域的裂解與重構：kucapungane 人地圖譜與空間變遷的再檢視〉，《考古人類學刊》69 期，頁 9-44

何欣潔（2011）《禮納里部落系列》報導，莫拉克 88news.org

洪育增（2020）〈部落亮點成「違建」政府強拆原民死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洪新恩、徐琬婷、黃珩婷（2014）〈什麼是家？好茶部落宜居生活的想像與建構〉，地理眼

胡哲豪（2012）〈禮納里災後重建後的空間敘事 — 瑪家白鷺人的尋根故事〉，https://blog.xuite.net/a7364099/mj/58702271

塗佩菁（2014）〈從部落遷徙歷程探討地方認同的建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學報 》22 期，頁 35-52

葉高華（2017）〈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臺灣史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頁 125-170

劉怡馨、吳宜靜（2020）〈原民悲歌 流浪永久屋〉，蘋果新聞網

違建的都市修補

撰文 康旻杰

違建處理並非近代的都市計畫議題，早在1950 年代的威權時期就已經是不得不面對的都市治理窘境。一方面大量二戰後的政治移民在極短的時間湧入都市地區落腳，卻在遙想反攻復國而幾無住宅政策的黨國體制下被迫自力救濟，利用有限資源在尚未闢建的公有土地搭建「臨時」住屋；另方面現代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尚未全面落實，連政府本身都在公有設施用地上興建居住單元，如大安公園原土地上的建華及岳廬新村，甚或國際學舍，都違反公園預定地上的使用內容。這些「違建」，相當程度緩解了當年移民暴增但住宅匱乏的治理危機，政府處理的手段並非興建大量公共住宅，卻刻意啟動了重點拆除的機制。

但當年光臺北市就達 10 萬戶的違建量，讓強拆迫遷的過程，徒然迎來更多決絕的反抗。許多無處可去的違建戶以死相逼或毆打執行的警察及拆除者，民怨積深，政府只好逐步放寬違建認定，乃至出現依不同年代定義的「新違建、舊的新違建、舊的舊的新違建、舊的舊的舊違建」（張景森，1993）之荒謬分類，最後真正被及時處理的大概也僅有新違建。早年的戰後違建幾乎成為歷史共業，究竟是必須解決的都市問題、或其實是解決了都市住宅問題的戰術，其實值得爭辯。

就像每一個力求生存的戰術，都凸顯了宏大策略難以因應的結構性問題。草根違建的集體動員，回應了需求 (need) 導向的社會現實，而非欲求 (want) 無厭的投機加碼（當然，還是有豪宅屋頂違規加蓋泳池之類的違建，姑且視之為豪奢個人對集體創造性文化的廉價挪用)。違建的營造行為，絕對是高風險的「投資」，一旦被舉報即血本無歸。因而，違建通常依附著非正式營造系統，以最低的材料及施工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完成堪用之建築和附加物件。換個說法，違建助長了非正式營造產業鏈及相關技術的成熟。違建營造的默會知識，也隱含了業主－工班間的信任網絡和鄰里間的協商機制。違建的生產，正是非契約性建築行為及其社會關係的展現。所以，違建必定是在地的。

違建有如沒跟上現代性的前現代狀態，但不意味著與時代脫節的不合時宜。若違建的類型被劃出現代以外，卻仍緊緊嵌合於當代之內。這個當代，也包含了歷史留存下來、無法與斯時此地脫鉤的空間殘跡。其中有些無法以現代建築結構、防災、及土地使用標準認定，另有些則從歷史的骨架有機長出難以被核準的現代性單元或構築。如社子島禁限建下，為持續擴張之家戶人口所增改建的單元，與現代性透天厝的形式並無二致，但被貼上違建標籤後，便順勢被現代排除－即使禁限建本身乃國家單向強勢的地方干預，而非居民自主選擇了違規加建的取徑。相反的，南機場公寓的奇觀化外觀，卻由經典現代主義建築繁衍出巨大寄生獸體般的違建義肢元素。但除非由個別住家單元之內向外逆轉看的觀點，並理解時間在空間的滲透作用，否則違建形式將永遠只是被獵奇的表象。違建的樣貌，儼然反映了在地居民與每日生活協商或拼博、不得不然的掙扎。

相較於歐洲意向性強烈的佔屋 (squat) 運動－那種有意識透過違法佔據公私閒置房屋土地的公社住居抵抗，台灣的違建大多是某種從計畫法令的縫隙鑽出的集體無意識蔓延。這兩種價值觀差異極大的違建行為，同時並置於同一處空間不見得相容，甚至可能在生活的邊界發生衝突。即使充滿各種私利算計及「奸巧」，違建內部自有其來自協商的公共性，一旦因其中利益矛盾（不只是價值矛盾，也包含了不同土地使用內容的不相容矛盾，如違建家園中的違建工廠）導致「共域之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Hardin, 1968)，反而給予國家現代性治理接手的正當性理由。

違建的脆弱不只暴露於現代防災系統的標準檢核，也具現於從集體進入公共的機制轉適過程。往往當外部力量造成內部危機之時，違建成員才意識到鬆散之集體轉型為緊密共同體的必要。違建共同體的組織動員，在民主化的本土仍得以撼動國家的政策走向。這不只單純訴求違建戶居住權、工作權、或近用城市權的基本權利，而是透過共同體更積極學習從違建

經驗與機制進行的各種「都市修補」(urban bricolage)，如 Roberts (2018) 所謂「詩意湊合著用的藝術」(the art of poetically making do)。有別於因資本過度積累而在不同區域自我修正的空間修補 (spatial fix) 概念，違建的都市修補術，本就一直為頻臨激變危局的城市政治及經濟有機地填補計畫和政策的破洞。當代創意的都市修補，如蟾蜍山違建聚落的共生轉型，更潛藏著理性都市計畫之外的另類規劃視野。

從違章加蓋到違建工廠，從違章建築到違建聚落，違建始終默默扮演者支持生產、穩定再生產的角色，也是都市歷史最常被遺忘但不容忽視的環節。擺盪在污名化和浪漫化的兩極，違建的政治與詩學 (politics and poetics) 需要從真實的田野不斷辯證，進而立體重構。

張景森，1993，《臺灣的都市計畫（1895-1988)》，臺北，業強。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3859): 1243 – 1248.

Roberts, L. 2018. Spatial Bricolage: The Art of Poetically Making Do. Humanities, 7(2), 43.

記錄 傅 裕

今天要講的個案主要是我之前 2013-2015 年所在田野，距今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現在和學弟妹聊起來大家都一臉茫然，所以我有點害羞現在再來講這個話題。但今天再提起來，也許可以作為一個全新的故事來聽。

【非正規住居的形成與消失 - 華光社區】

華光社區，在中正紀念堂的旁邊。大概 12 公頃的土地。這是我原本的碩論田野。

華光社區為什麼會形成呢？最初在 1904 年之前，這裡是台北城外的一片空地，上面是一些農田。在日本殖民時期，日本殖民政府需要建一棟監獄，於是選中了這個位址，並且在上面建造了台北刑務所。如果大家有去過嘉義舊監，也許大家也看過這樣的八卦形建築物。以前蔣渭水等人曾經也被關押在這裡過。關於這個監獄的歷史，已經有學者研究過，感興趣的同學可以自行了解。

監獄的旁邊建有幾排宿舍，供給在監獄上班的員工居住。二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來台，也延續了這個地方原本的功能，改建成台北監獄。這些宿舍，也就成為司法機構的職員居住的地方。1960 年代後，台北都市人口逐漸擴張，這塊地區也被關注並開始提出再開發構想。當時的執政者覺得這個地段可以有比監獄更適合的用途，於是決定要將台北監獄搬遷，開發這片土地。於是台北監獄被搬遷至龜山，而這片土地則被標售給當時的國營企業：中華郵政和中華電信。所以 1970 年代後期到 2013 年這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家如果進入到這片區域，能看到中華郵政和中華電信的辦公大樓。而旁邊的宿舍則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仍舊是作為司法部門的公務人員作宿舍使用。

國民政府來台後帶來的大量外省人口遷移來台灣，多數人口集中在台北市區。但當時台北並沒有那麼多的房舍可以容納這些外來人口，所以大家就在空地上就地搭建房舍，也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違建的發展歷程。同樣的，華光這個地方的宿舍數量也有限，因此當時也有部分人員沒有被分配到宿舍，也就在政府的默許下在宿舍周圍的空地自建房屋。1960-7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很多來自中南部農村的移民也來到台北發展，他們也通常會在這些空地上自建房屋，或是向原本自建房屋的屋主購買二手的房子。

華光這個聚落曾經一度有上千戶人家，這裡也形成了較為熱絡的地方經濟。在 1970 年代，這裡是台北知名的古玩市集。這裡也自發形成了早市，供附近居民在中正紀念堂運動完後選購早點、蔬菜、衣服和小吃等。在早市擺攤的人很多也是華光社區的居民。在不少台北市民的記憶中，華光社區總是與美食聯繫在一起。包子饅頭、豆漿燒餅、廖家牛肉麵等外省美食很是出名。此外，這裡也有很多弱勢家庭居住在這邊，他們的收入不穩定，也有些家戶成員是身心障礙者。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聚落，在 2013 年被完全的搬遷拆除了。之後這裡變成了一片空地，只留下了被指定為受保護樹木的老樹，以及周邊些許不影響開發且被指定為歷史建築、有文資身分的日本時期宿舍。雖然 1960 年代之後政府就開始不斷對此地提出都市更新與開發計劃，這片地區真正面臨剷除是在 2005 年行政院將其列為優先推動都市更新地區，與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台北南港高鐵沿線再開發、台鐵舊高雄港站及臨港沿線再開發等稱為四大金磚之時。當時對這片土地的想像，是打算將其建設成金融商業區，打造台北華爾街。後來因為產業發展與台北都市機能的轉變，中央發覺觀光也是一大發展亮點。於是「台北華爾街」的想像變成了「台北六本木」。由於華光社區就位於中正紀念堂旁邊，與永康街也很近，政府設想如果這裡未來能成為飯店與百貨商場，那麼就能串起台北的觀光軸線。目前為止，這裡也依舊是如此想像與規劃的，只不過政府在等待房市好轉後能夠標售地上權，來落實這樣的發展想像。

▲1945年美軍航照顯示的台北刑務所及附屬木造建築（圖片來源：中研
取用網址：http://gis.rchss.sinica.edu.tw/mapdap/?p=3021）

其實在我還在田野的那幾年，政府已經準備好要標售這片土地的地上權。但由於拆完後的幾年房市相對低迷，於是他們的發展構想就被擱置了，也許未來這個計劃還會重啟。也正是在這樣的開發願景之下，住在這裡的居民就陸續被法務部提起訴訟要求搬遷。當然居民也自發成立了自救會，對立法委員或是議員進行遊說，也同時進行抗爭運動。我接觸社區已經是 2012 年末，當時已經開始準備要拆房子了。因為迫遷壓力，居民們很多都選擇自行拆屋遷出。

研院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
。

【非正規住居的犯罪化】

我們進入社區的時候已經是拆遷的後期，很多居民已經迫於壓力搬遷了。當時搬走的大部分居民還是自己想辦法，自行租屋或是搬進親友家。少數居民有獲得政府的協助，得以遷入平價住宅或中繼國宅。有榮民身份的居民，榮民之家會協助他們安置。

像華光社區這樣的狀況，在台北都市發展的脈絡之中並不算是個案。當初我們碩一在實習課時就曾經做過這麼一張圖（圖片 3：需要麻煩學姐提供），標註了文獻中記錄的大規模非正規住居的拆遷地圖，像是華光、紹興、大安森林公園、14、15 號公園、圓環、中華路上的西本願寺等，曾經都是大規模的非正規住居。早期這些拆遷案，會搭配有整建住宅政策來安置拆遷後的居民。列如南機場，就是整建住宅政策的產物。我曾經看過一個統計，1960 年代台北市居住在違章建築內的人數大約是全台北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也可以說住在違建裡，大概是某一個年代大家的集體記憶，像是《孽子》、《搭錯車》等作品所描述的居住環境，都是展現了這樣一個普遍的居住狀況。

回到社區，在當時接觸的許多華光居民，他們都表達了對於自身處境的不解。他們並不像早期拆遷一樣是有安置住房的處理，反而是需要賠償不當得利給政府，還得自行尋找安置出路。也許現在從法律角度來看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處理方式，但在這些居民的生命經驗中，這是很無法理解的事情。

與東亞其他國家的拆遷安置處理比較起來，台灣這樣的處理是很特別的。行政機構不用做什麼事情，直接將違建居民一紙訴訟告上法院，讓法院判決強制執行。雖然這件事情還沒有被很仔細的研究過，但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並且提出一個概念：非正規住居的罪犯化（Criminalizing Squatters）。這個詞某種程度很符合居民們當時的心理感受：他們一輩子安分守己，連警察局都沒有去過。卻一朝被法院訴訟，背上了有罪的指責。

【國有土地清理活化制度】

但何以至此？過去在討論違建拆除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從都市發展的主流政策去討論。但我認為就華光的狀況來說，關鍵點其實在國有土地清理活化制度的變化。在 1980 年代這個制度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變：當時民主化帶來政黨競爭，很多黨外人士在質詢的時候會拿國有土地管理不善這件事情質詢政府機關。這讓政府機關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比如 1990 年代高爾夫球場占用國土資源、台灣財政危機是由於沒有妥善管理土地等議題的討論，成為了政黨之間攻防的焦點。除此之外，違建議題在輿論上從以前多為體恤窮人，開始轉變為認為這是違法建物，政府應落實法治加以處理。再加上司法本身能夠滿足治理的需求，其可預測性也很高，對於機關來說這就是很好用的工具，不用直面居民反迫遷的壓力，可以透過訴訟結果取得執法安全的地位，也能正當化自己的開

▲2013年3月華光拆遷過程（圖片來源：Peopo公民新聞。取用網址：https://www.peopo.org/news/109954）。

發目的。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官僚基礎行政能力提高，完成了國有土地的清查。於是機關就能挑出特定的被占用土地去處理；再加上不同行政機關主管系統間的勾稽比對，更便利且精準地標記出到底是誰在占用國有土地，能夠精確處理。此外，國有土地分成公用與非公用，公用土地掌握在各個行政機關的手中，財政部雖然是主管機關，但以往它很難要求其他機關也合作一起完成國有土地的清查。直到 2000 年財政部成立了一個管理小組，兩年後這個小組被拉高層級為行政院所設立的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於是財政部門的事情被提高為行政院的重點事務，可以進行更大方向的檢討與計劃，要求各個部門來配合。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財政部逐漸取得了不同於早期的重要角色，雖然現今這個小組已經解散，但這樣的處理模式至今還是延續著。

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提出過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來說明東亞國家的發展：發展型國家，而後在討論國家發展轉型時，會將新自由主義化作為發展型國家轉型的觀察重點，像是王振寰和李宗榮等學者都提到在這個轉變之下國家能力的弱化。但在都市再開發的脈絡下觀察到似乎並不是這樣。像周素卿等學者提到都市再開發是透過公私合夥，這些大規模的都市規劃再開發得以展開，政府需要提出一個很大的構想藍圖，雖然這樣的構想藍圖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私部門的影響，但能夠達成實際上還是相當仰賴政府的能力。從國有土地的角度來看，應該把土地找回來，不只是將土地看作是計劃的容器或是背景，而是直接去觀察土地是如何被處理與運用，能夠看到國家角色的變化，這也是另一個能回應國家發展轉型問題的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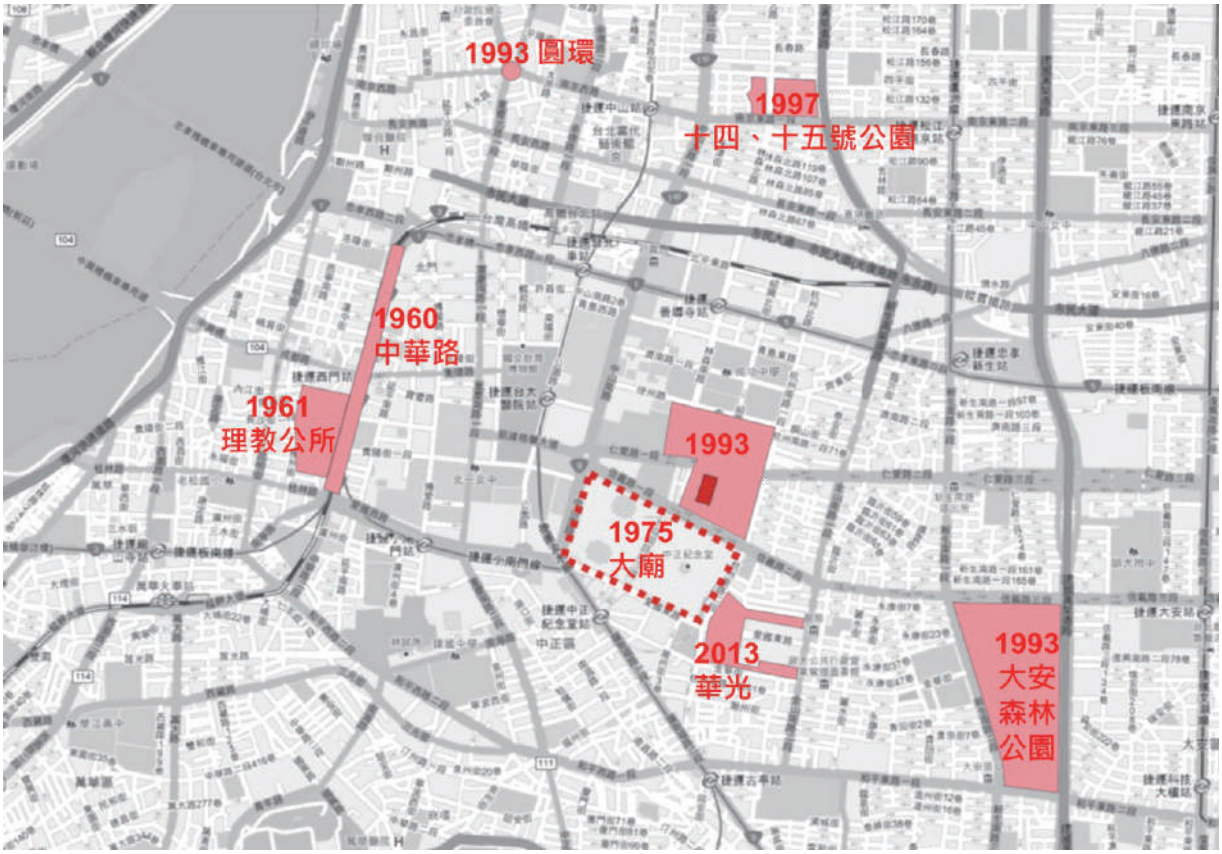
我認為，在這些轉型的背後，國家是逐漸具有更緻密的治理能力的，迫遷狀況呈現出的反而是國家能力強化與變得更精緻的過程。比如說桃園航空城與社子島的迫遷狀況，我們都能在表面上看到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峙，但支持者與政府之間往往會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而正是地方上這樣的對峙，讓開發計畫能夠在地方上生根發展。反而是雙方對抗的空隙，讓國家的發展想像從這樣的空隙中生根發芽並且更加茁壯。

【另類出路之可能】

以上所討論到的都是我之前在田野之中的觀察與研究，那麼現在來分享一下面對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其他的出路？我之前待過社區的田野，參與了抗爭，也做過規劃與在公部門任職過，所以在此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經驗。

社區組織通常都是從遇見社區和了解社區等的社區工作開始做起，去了解居民在想什麼、了解社區的狀況與環境等。面臨拆遷的社區的社區工作也有像是社區營造的部分，但實際上又有所不同。在華光，社區面對迫遷會發生很嚴重的社區分化，加上透過訴訟進行的拆遷處理方式，會分裂社區團結。面對拆遷的社區連帶關係是多重且異質的，他們個人的抵抗策略也會有所不同。在我的觀察中，居民會用官方的身份分類不同人群。比如說某違建、某眷舍、某個要賠錢的眷舍等等，這樣的分類方式是法務部展開拆遷處理工作之後才出現的稱呼。縱使大家從小都一直生活在一起，但遇到拆遷之後卻被分成了三類。在這三類之下，法務部將需要拆遷的違建戶告上法院，是以個別家戶為單位。他們會將屋主作為被告告上法院，而每一個被告遇到的承辦人也不一樣，導致他們的訴訟進程與選擇和解時可能談到的條件也不同，所以每一戶家庭在這樣的過程中被拆解成為一個個的個體，我將這個過程稱之為分子化。這個過程有時候也會造成家庭內部的紛爭。

早期國家的拆遷安置方式，有一種是給拆遷戶提供安置房的地上權購買，但在長住之後住戶最終也可能有機會可以買下房屋所在的土地。這是很多居民對於拆遷的一種理解，雖然實際上也有住戶沒有錢或機會買下被安置的土地。不過，這種選項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不再存在，社會住宅或許才是可欲的選擇。但有些居民會認為社會住宅是一種不穩定的居住狀



▲圖片來源：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

態，因為租期年限的限制，幾年後又得面臨搬遷。有的居民希望可以爭取此地都更，讓他們在都更計畫中獲得安置，但也有的居民會擔心害怕都更後的狀況。這些不同反應也都是由於國家在不同時期對拆遷以及對這塊土地採取的政策不同所引起的。

所以我們常常談到鄰里網絡因為拆遷而導致破壞與斷裂，並不是單純的物理環境上的分離，而是在拆遷過程之中，居民被強迫捲入的各種利益衝突所導致的社會連帶破壞，每個個體自我掙扎去追求自己認為比較好的方向，但也可能會影響到別人的需求。這大概是很難有解方的事情，只能不斷去嘗試找出一些共同的基礎或方向。

另外，我們在進行反迫遷的社會運動與倡議時，通常比較難得到一般大眾的理解。一般大眾會認為居民居住的地區已經是黃金區位，而且免費居住、不用付錢，而他們一般人還需要每月負擔房租或房貸等等，所以無法同理受迫遷居民的處境。所以讓大家理解真實的狀況是社會運動和倡議的重點，我們要去面對誰、鬆動誰，是倡議要去思考的首要問題，而社會的認識與對話很重要。

以華光當時的運動與倡議來說，主要是去凸顯社區的特色，並試圖建構出權利的基礎。像華光這樣的社區，最大的挑戰就是一般人認同「所有權」的邏輯，認為居民占用國家土地就是不對、該拆。所以我們一直在試圖讓大眾認識與了解這些社區的真實狀況，像是社區導覽，街頭論壇等等讓大家真正看到社區環境的活動，透過各種方式去吸引不同的人，引發更多不一樣的思考。再者就是去討論城市權與居住權。第三點則是擴大網絡，與更多的組織結盟。因為面對的是訴訟迫遷，加上當時政府將簽兩公約視為政績，我們也嘗試發展居住權的論述來回應所有權論述，我們當時主要結盟的是一些人權團體、法律團體等。另外我們最終還是要面對都市發展議題：我們到底在追求什麼？真的是台北六本木或者華爾街嗎？這部分其實就是去連結都市和空間專業與文資和樹保團體。這些都並不是我們一開始就預設好要去走的路徑，而是在實踐的時候發現我們的活動會吸引這樣的人群和關心，所以才開始往這些面向發展。

擴大網絡組織結盟的路線，其實也是台灣社會運動特質。這樣的網絡可以把自己的議題擴張，但也會面臨一些挑戰。比如說時效性較短，而且這樣的網路高度仰賴人際關係，所以當特定的個人淡出，這樣的網絡很有可能難以延續下去。並且不同的運動團體之間也會有差異，如何在差異之間磨合與對話也是很重要的課題，比如婦女團體有一些進入體制、操作國家機器的路線，但其他議題組織也許不一定接受這種做法。我們當初想要成立一個台灣反迫遷連線、一個跨個案的組織，是希望能夠延續議題討論，因為如果沒有辦法類似的持續運作，既有經驗與成果的累積其實也會受到影響。經驗的累積如果只能綁在個人身上，也很難傳承下去，所以我們編輯了一本《反迫遷手冊》，裡面介紹了一些迫遷制度的科普與分析，也給了一些面對迫遷的建議。

面對再開發，我們當時也嘗試去討論民間版本的規劃方案。提出另類規劃方案可以說是城鄉所參與都市議題的一種特殊的方式，以前所提出的有些替代方案最後也被市政府買單，像寶藏巖就是一個例子。華光社區我們也嘗試提出了另類規劃方案，最後都委會也在不斷的討論與會議之中採納我們的建議。當然這個過程也會有很多挑戰，一個是要如何在方案發展過程中與居民互動，把他們的聲音轉化與呈現，比如居民本身的意見就會存在差異，如何轉譯、提煉他們的真正需求其實是很有挑戰的。此外，不同領域在意的焦點其實也有所不同，比如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居住的需求之間可能存在張力。所以這些都非常挑戰規劃者的轉譯與調和能力，最終也許需要靠天時地利人和才能有好的結果。

最後，我們也來聊聊體制內可以做什麼。但是在做什麼的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知道這個體制到底是怎麼運作的。我們首先要能夠

回答這個體制如何運作、問題出在哪裡，才能往對的地方找答案。比如說迫遷，看起來都是房子被拆掉了，但不同個案背後依據的制度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所對抗的論述和策略應該也是不同的。所以想要進行倡議與遊說，如何找尋破口的首要關鍵也是要去了解體制的運作模式。

除了了解體制，我們也需要一種同理心。我們常常說換了位置也就換了腦袋，但其實體制內的人也是人，我們也要去思考體制內的人在思考什麼樣的問題。例如政治人物也許在思考的是如何趨吉避凶，所以我們也許需要換種思維去思考如何把我們在意的事情做向吉的面向。制度的轉變需要人的推動，所以我們也需要發展更多的人去理解、去思考破口的出現。如果這個制度的運行是依靠機關的慣性在運作，也許尋找到打破慣性的人就會是改變的錨點。

雖然我們說想要在體制內推動一些進步價值，可以透過在體制內的結盟，例如刑幼田老師談「進步的規劃師」，認為需要群眾動員與裡應外合，但我自己覺得同樣重要的是如何讓更多不同位置的人願意去思考，並建立起持續的網路。規劃訓練雖然在處理空間，但更重要的是對不同立場與需求的敏感，並具有提出更包容方案的能力，這樣的能力其實不只可以用在空間上，在很多地方都很受用。

最後，作為另類出路之可能的小結論，其實不管在什麼位置，處理什麼樣的議題，我們都需要持續的研究與思考，定位我們的目標與轉變時機是什麼，並保有與不同位置對話與連結的空間；此外也必須保持自省和說真話的能力，這很困難，但卻是一切有可能的開始。

記錄 傅 裕

首先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背景。我是台南人，一直都在台南唸書，大學去讀了成功大學的中文系，後來進行都市計畫系的雙主修。就在我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南鐵東移案就發生了。那時候是 2011 年，自己還是一個事件外圍的學生，參與的並不多。那時候作為學生去和居民互動，幫他們寫故事，記錄歷史。譬如最近剛被拆除的陳家，那時候我就在幫他們記錄房子的故事，透過劇場形式表現沿線家戶的故事。也是那時候的參與，才讓我最後也選了這個題目作為碩士論文。

但今天我暫時不聚焦在最近的爭議。我想要說明的是，自我來到城鄉所唸書後，我開始思考: 在居住權、保障私有財產權之外，我們作為規劃者該如何看待鐵路地下化。鐵路地下化這個政策，是怎麼來的？這是一個好的政策嗎？

【通勤與旅行的經驗，反思台鐵地下化的政策問題】

有趣的是，台灣人在台灣的歷史上認知總是不太夠。我們對中國或是世界的歷史總是手到擒來，但反而對身邊的城市發展歷史十分陌生。高雄鐵路地下隧道在兩年前通車，那時候請來了知名建築師（麥肯納設計團隊）設計這個車站，站台設計的非常宏偉，光鮮亮麗。但走進去迎面駛來的卻是一輛很舊很舊的列車。像是自強號與莒光號，都是有點年代的車輛了。這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引人深思。前段時間的台鐵員工罷工事件，也說明了鐵路工作環境不佳。這一切是否有關聯？我想大概是有的。

高雄鐵路地下化從 2002 年開始建設，距今 18 年。雖然已經通車，但地表層至今也還沒有完工。這是工程出了問題嗎？資本進來了嗎？都市縫合了嗎？又為誰縫合了呢？城市的景觀真的有變好嗎？我認為暫時還看不到效果。鐵路地下化的過程並不是一個實體空間的改變或是單純的工程，而是代表了社會轉變的狀態。

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全長 8 公里，受到東移影響的家戶總共三百到四百戶。其範圍包含仁德區、東區以及北區。台南市政府宣稱，台南市有八到九成的民眾支持鐵路

▲台南鐵路東側現況。攝影：吳昀慶

地下化。其實，倒不如說台南市有八九成的人不滿意現在的交通狀況。再具體一點，大家不滿意平交道的使用體驗。但回頭再思索，這個問題是只能由鐵路地下化去解決嗎？

這就要講到台灣鐵路地下化的特殊性了。鐵路地下化的想法，大約在民國六、七十年代就已經提出。然而，鐵道專家蘇昭旭提到一個觀點：將中央車站地下化，這樣的做法在全世界的鐵路系統中非常少。比如紐約中央車站、巴塞隆納的聖徒車站、華沙中央車站等。全世界將中央車站地下化的比例不到 3%。

也許會有人想要提問，地鐵不算是地下化嗎？在此我需要提醒大家，我們今天討論到的台鐵，是指城際運輸鐵路。而我們通常所說的地下鐵（捷運系統），是城市內部的通勤系統，一般都是地下化的。話說回來，為什麼世界各大城市的的中央車站不做地下化呢？這是因為投資過高，曠日費時，投資回報比例過低。高雄鐵路地下化了 18 年，到現在的地面層依舊煙霧瀰漫。台南鐵路地下化至今牽連大批民眾拆遷，整個施工過程對於城市的環境是災難的。小英總統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八千八百億」計劃，很大一部分的投資是放在鐵路改建上面。而當時交通管理背景的張勝雄老師曾發動聯署反對，也正是因為投資回報比的問題。

張勝雄老師有段簡單卻精準的描述：「鐵路如果鋪設在地面的成本是 1，那麼把它高架起來的成本就是 3，而地下化的成本會是 9。」這要怎麼理解？將鐵路高架，我們需要修建橋樑、翻新機電設施成本，而地下化還需要打通、養護隧道，這都是極高的追加成本。除了財力這種顯性成本，社會成本這些隱形成本我們都還沒有算進去。而且，地下化或是高架化，其實並不能提高運量。這是因為服務範圍沒有增加，甚至更因為地下化隧道的關係，未來會更難擴充軌道數。因此，台鐵收益並沒有增加，但隧道與橋樑的保養與維護成本卻會不斷增加。所以我們整體的運輸建設計劃，其實並沒有考量到台鐵局的營運困難。

【台鐵地下化的政策簡史】

但為什麼我們還是繼續建設了這樣不符合效益成本的工程？其中是有歷史遺留問題的。可以大膽地說，鐵路地下化在當時是一場誤會。戰後台灣經濟增長，導致物質生活有了極大的提升，燃油汽機車輛增多，使得平交道成為了明顯的交通問題。當時省政府與台北市政府開始在討論鐵路是否要地下化或是高架化，但因為預算經費問題僵持不下。而 1969 年時，北京第一條地鐵通車，其設計具有戰備功能（地下化能夠躲避敵軍戰火，保證交通運輸線路）；再加上 1979 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這時的蔣經國政權風雨飄搖，在政治壓力下，終於拍板要將鐵路地下化，以保證在戰爭時期的軍需物資運送。所以台北鐵路地下化的開始，是極強的國家意志推動的。“中央政府原本屬意更為便宜的鐵路高架化，但擔憂戰火爆發，癱瘓交通。”於是規劃設計全部重新來過，改為遁地的地下化工程。當然也有一說，是蔣經國總統當時混淆了台鐵系統與地鐵（捷運）系統，因此才有這樣的決定。1984 年台北地下化工程正式動工，我們的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借給我們一筆款項用於該項工程，而這筆錢我們一路還到 2003 年。

很多人在談國民黨的技術官僚時，常常會一併提到孫運權、李國鼎，讓我們成為發展型的國家。但其實在技術官僚的內部也有分工、

甚至是瑜亮情結，不能簡單地一併視之。當時支持台北鐵路地下化除了小蔣總統本身，也有行政院長孫運權主管這個國家級的建設。有趣的是，小蔣總統與孫院長的求學背景都與蘇聯體系的工業教育比較有關係，兩人都能說俄語，關係較為親近。但依舊還是有反對的聲音。當時不贊同台北鐵路地下化的，有高玉樹和李國鼎。高玉樹在早稻田大學留學，他曾經以黨外參選台北市市長。而蔣經國擔憂他是否會人氣過旺引起民心思變，於是才將其調度為交通部部長。李國鼎則是竹科的牽頭人，是當時非常重要的財經技術官僚。其學歷背景也更偏向於美國，所以其思維方式與蔣經國、孫運權等人不太相同。他在竹科的成功讓蔣經國有些忌憚，逐漸將其排除在決策權之外。所以當時幾位官僚與總統之間的人際關係，也影響到台北的鐵路地下化這一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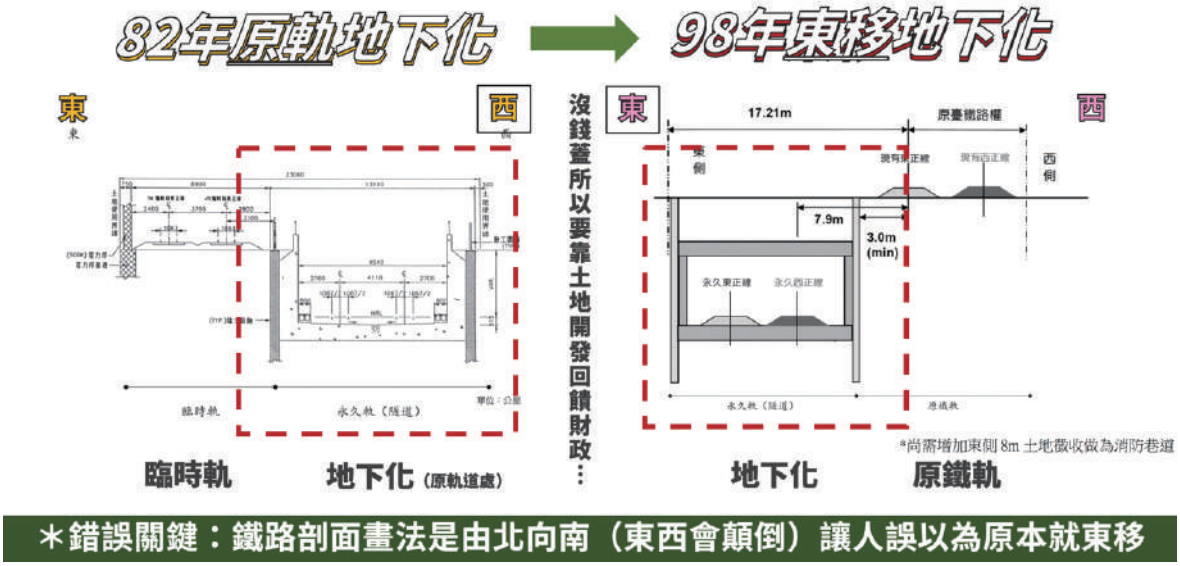
1984-1989，台北完成第一期的鐵路地下化工程，這一舉國之力達成的大工程並沒有實行其戰略軍需功能，而改善交通的政績則落到了連戰的手上。所以當連戰之後出任台灣省主席時，就開始在台灣各大城市（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對於鐵路地下化一事做可行性評估。當然其評估方案，也包括地下化、高架化與郊區化等，但最終的結論都是需要進行鐵路地下化，複製台北模式。只是，後來台灣的時空背景轉變（主因是經費不足），這件事情才擱置。而不少城市因為地下化工程經費過高的緣故，不少改以高架化代替，如台中市就是一例。

【台南鐵路東移的原因：經費與自償率的考量】

那為什麼南鐵會東移呢？其實在 1993 年連戰時代的南鐵地下化並沒有東移，1995 年完成綜合規劃報告。省政府最初管理鐵路地下化工程，但在宋楚瑜職任時精省政府機構，省政府被精簡，於是台鐵被納入交通部的管轄範疇。1995-2007 年中央與地方關於工程經費問題一直無法談合。2007 年陳水扁總統執政末期，政府政權不穩。

台南市長年綠營執政，十分需要一個大型的建設。於是蘇貞昌改編經費，於是開始啟動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而土地開發則是去補償經費的做法，這讓反對者認為這也是最終導致設計變更，使得需要拆遷的原因。確實任何的公共工程都不是免費的，但我們的建設過度仰賴土地開發讓建設回本。原本南鐵東移案騰出 15-18 米完全不會有任何收益的增加，不過是在市中心騰出了一個巷弄。但騰出 40 米，則會出現一條大道，還能配合沿線都市更新開發，容積率上漲，效益更高。

原本 82 年的施工計劃圖上，永久軌將在原址地下化。但後來變更為永久軌埋在現在被拆除的人家下面，再加上備用巷道 8 米，才會有



▲地下化工程剖面圖。提供：吳昀慶

如今拆遷面如此之大的現況。

【沿線土地開發作為自償率來源的迷思】

鐵路建設自償其實有很多方式。比如提高鐵路票價，開發車站 BOT 建設等等。例如新竹市就捨棄了鐵路地下化的選項，決定直接進行大車站的興建與設計，增加車站的容量與機能，並且進一步改善車站周遭的步行環境。

但我們太迷信土地開發能夠回饋自償。比如台北車站當初做地下化的時候，我們的開發遠景很大，但實際上並沒有建設成這個樣子。是因為當時台北的開發資源都集中在信義區，台北車站反而沒有那麼大的誘因讓資本進駐。京站轉運站是台北市政府拜託日勝生集團開發的，所以才會出現我要轉運站，但建出了百貨公司的情況。正是因為開發誘因不足，政府與投資者的合約不斷拉鋸讓利，最終才出現公共設施的樓地板面積只有 9% 的情況。土地開發市場並沒有那麼樂觀，但現在我們在討論自償，卻一直都是這樣的思路。

台鐵如今的營運狀況，資產負債目前達到四百億，從民國 55 年到 105 年，員工數不斷下降至一萬三千人，但工作量卻在不斷增加。現在回看都市計劃法，很多當初的構想現今我們都做不到。當初所說“鐵路公路在行經市區應避免穿越市中心”，但我們看到台灣的鐵路現在似乎都穿越了市中心。鐵路一直都在城市的中心嗎？其實並不是。以台南鐵路發展來說，1970 年代鐵路和市中心其實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但因為人口增加，發展區開始移動到鐵路的兩側。市中心人口流失，但市中心的商業機能依舊保存。居住人口開始移動至城市的東西兩側。而也正是因為人口的增加，汽機車數量增加，最終才使得鐵路成為阻礙交通原因。

【結語：私人運具為尊的都市體質，才是都市問題的病根】

近年，國土計畫一直說要盡量維護土地，但其實不論東台南副都心還是南台南副都心等都一直在發展。鐵路地下化後，我們以為其資源能回歸都市中心，但城市的發展策略仍舊一直往郊區移動。這能真的解決交通問題嗎？當人口不斷外移，交通需求不斷增加，交通的矛盾還是一直存在。鐵路地下化的工程本身雖然標榜沒有在圖利，但這個工程的話題所帶動的土地市場交易噱頭卻一直在刺激房價，新的計劃區將農業用地變更至住商區，全部都標售給建商開發。但這真的能夠解決住房問題嗎？

所以鐵路地下化，我們的代價到底是什麼？除了多次的警察暴力，台南鐵路周邊的文化資產會被消滅。日治時代許多的歷史建築都在工程中拆除。在一個城市中，道路用地的面積其實有 20%~30%。但我們在談論城市議題，總是在談論居住正義，希望能夠訴求住的公共性，以此尋求國家與社會的再公共化。交通議題也應該如此。今日道路空間 80% 留給汽車，15% 供給機車，而只有 5% 留給行人的時候，大家就會不斷想去購買汽車或是機車。如果沒有機車就寸步難行。如今台南每十個人就有十一輛私人運具，那什麼才是台南真正的交通問題？是平交道嗎？大概並不是。道路空間設計，才會是我們最大的設計問題。

陰莖獨白

畢恆達

國立台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專任教授

2020/12/9(三) 19:00 - 20:30(18:40入場)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公館樓地下室
(106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148號)

【城鄉所經典大師系列演講・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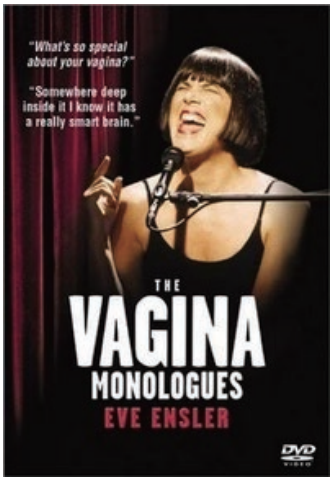
記錄　葉庭瑜

城鄉所學生會在十二月舉辦兩場大師演講，首先邀請到的是本所畢恆達老師，與聽眾分享老師剛剛告一段落的《陰莖獨白》研究計畫。這場演講由學生會幹部揭開序幕，以短劇的方式與觀眾近距離互動，唸出生動獨特、讓每個人會心一笑的陰莖故事，也縮短觀眾與這個看似令人害羞卻又神秘的題目之間的距離。

其實「陰莖獨白」這個概念，源自於 1994 年首度演出的舞台劇《陰道獨白》，由美國劇作家伊芙 · 恩斯勒（Eve Ensler）訪問兩百多位女性後創作發表而成，核心概念是「如果我們不說，秘密會變成羞恥」，後續引起全球性的 V-Day 運動，在暴力終止前絕不罷休。而台灣則於 2005 年由暨南大學外文系首次公演此劇，同年勵馨基金會、台灣女人連線、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協會等也同步申請演出，延續至今，啟發了許多人對性別的認識。

而畢老師則有感於陰道獨白已然出現，不知何時才能看到剖析男性的《陰莖獨白》？女性總是男性凝視的客體，就像美術館中女性畫家少之又少，裸體畫像中卻有超過 85%的主角是女體；相對而言陰莖卻只出現在標榜客觀理性的醫學研究、或者誇大不實的色情描寫中，為陰莖覆上一層虛構出的宏偉假面。在這樣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女人被貶為缺失陰莖的男人，「男子氣概」一詞則定義於女性氣質的對立面，「女性」變得像是一個貶義詞。同時陰莖則消失了——雖然處處皆是陽具的意象與特權，但為了保持其神聖性與神秘性，物質陰莖則不能被看見。這也是畢老師進行陰莖獨白研究的初衷，為的是揭開神秘的面紗，讓我們看見一個個真實、獨特而平凡的陰莖經驗。

在研究中訪談了 22 位不同性取向的男性，請受訪者回答有關陰莖知識、陰莖感受、陰莖改造、陰莖想像等主題，而本次演講則分享了尺寸焦慮與第一次射精感受。有關陰莖的尺寸焦慮，受到過分誇張強調男性性器的色情文本影響，許多男性都有陰莖過小的羞愧與焦慮，縱使理性認知自己尺寸是正常水平，卻還是擔心自己比別人短或細。陰莖的尺寸大小開始具有生理、功能之外的意義，更擴大成為男子氣概的重要象徵，而影響男性人際關係中的社會階序。這樣的小陰莖症候群讓男性們對自我評價過低，當面臨需要裸露的場合，如更衣室、或發生性關係時，無法不恐懼於自己有可能受到他人或性伴侶的負面評價。這說明了父權社會建



1994 年，伊芙．恩斯勒發表了轟動國際的劇作《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這齣戲劇以她對兩百多位女性的訪談而寫成，這些不同年齡、職業、性傾向、種族的女性生命故事，榮耀了女性的身體與性，展現其複雜與神祕，使本劇被視為新一代女性的聖經。

* 圖片、介紹源自博客來。

▲畢恆達老師演講現場。攝：姚麗金。

立起高偉的陽具形象讓眾人崇拜的同時，作為陰莖的持有人，男性卻也蒙受其害。

而男性第一次射精的感受，相對於初經，相關的研究或文學也明顯少了許多，因為月經可以視為純生理現象，但射精必然與性高潮、愉悅相關，變成一種性的禁忌。畢老師在研究中提出假設，若具有相關先備知識，那第一次射精的經驗應該是愉悅的吧？但事實上卻遠比這複雜，首先知識是連續性的，並非單純有或無可以區分，類型也分很多種，有人從色情漫畫中學習，也有人從中醫醫書或西洋畫冊中摸索。當然若先前沒有足夠知識，第一次射精時固然會恐慌，以為身體出了問題，但就算已經知道射精是什麼，還是會因為抽象知識並沒有辦法回答身體經驗、或者出於「性是不好的」這種想法，而對射精感到緊張或罪惡。只有少數人能夠明白射精是自然生理現象，有準備之下也抱有期待，第一次射精才能為自己帶來成長的感受。

演講的最後，則請現場不論性別的聽眾，寫下想對陰莖說的話，或想一想陰莖會對自己說什麼。有許多人想對陰莖表達感謝，也有人期待陰莖能長久陪伴自己，而想像中的陰莖則認為身體的主人應該感謝、愛護自己，希望不要被嫌棄。從今晚的演講與互動中，陰莖神秘、宏偉而崇高的形象正被一點一滴解構，我們看見陰莖與他的恐懼和焦慮，這個東西並不永遠是權力與慾望的象徵，有時也是不堪與痛苦的來源。只有細細的研究與探尋，描述真實而複雜的男性經驗，陰莖所建構的權力結構才有破解的可能，讓陰莖不再是某些人沒有的、某種天賦的恩賜，而是一個無需戰戰兢兢於度長絜大的、能夠與之平視的普通器官。

▲畢恆達老師演講現場。攝：姚麗金。

▲畢恆達老師演講現場。攝：姚麗金。

老T搬家

講者 趙彥寧

【城鄉所經典大師演講系列・其二】

記錄 姚麗金

同志老年化（LGBT aging）課題近年來逐漸受到學界重視，但受到學科化影響，相關研究多出自人口、公衛、社工界，關注如何為長者組織活動或人際網絡，並取得適當的醫療照顧。直接從老年、同志、性這樣的可能的污名出發，了解老年同志在社會運作中的關鍵邏輯，以及他們的實際感知與實作的民族誌研究則相對少見。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彥寧老師的「老 T 搬家」系列研究（共四輯，分別為〈老 T 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2005）、〈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趙彥寧老師演講現場。攝：姚麗金。

搬家續探〉(2008)、〈不／可計量的親密關係：老 T 搬家三探〉(2010)、〈與之共老的酷兒情感倫理實作：老T搬家四探〉(2017))專注一系列台灣老年女同志報導人的生命經驗，呈現諸如既存於異性戀家戶邏輯之中的台灣社會福利分配制度對中老年女同志的影響，中老年女同志兼顧原生家庭與圈內友誼關係的雙重敘事，以及社會政經結構的變化下不同世代女同志對於親密關係的衡量模式、對「老了」這個自我敘事關鍵詞的感知體驗等社會現實。

本次演講趙彥寧老師主要分享了她在做老 T 搬家系列研究過程中的田野經驗與倫理。她認為，很多 LGBT 研究的問題意識存在強烈預設，實際應該從田野當中生出論點才對。田野是充滿樂趣或者說幽默感的，作者與老 T 報導人之間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報導人重要的人生轉折都可能成為書寫材料。一些未甚理解的田野材料則成為一種 hunting，指引作者不停做價值比對。

我們無法體會老年女同志身體衰落的心靈狀態，但可以從他們的物質生活中覺察出一二。上世紀六七十年年代的老 T 們處於經濟地位上級，經常出入高消費場所，通過階級地位來轉移性別地位，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伴隨台灣政治解嚴，進入跨國經濟體，很多老 T 的技能不能適應新自由主義的要求，相繼失業，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快速下滑。並且，越進入新自由主義時代，人們之間也越習慣用貨幣計算邏輯來衡量親密關係，比如會有在酒吧與人交往，分手後被索要出場費的情況。這種情感的金錢計酬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情慾上的歇斯底里。不過，酷兒親屬關係(queer kinship)與普通親屬關係不同，譬如有些老 T 看起來很花心，一生交很多任女友，但實際感情要比我們想像的深厚很多，葬禮的時候歷任老婆一個個上來哭，所有人都是他的老婆，所有人都叫他媽媽，相對的，老 T 很少去找自己的原生父母，因為怕給他們帶來困擾。身份政治永遠蘊含著道德主義，道德主義會拘束我們的想像力和判斷力，換個角度來說，是這群老 T 報導人，讓我們看到我們的侷限與無能。

談到田野倫理，相較於一般的質性研究，性別研究強調研究者也是倫理的一部分，在避免報導者因為田野或論文寫作受到傷害的同時，也應關注研究者被報導者冒犯、騷擾或傷害的情況。趙老師的博士論文做的是九十年代台灣藍領階級女同志研究，她戲稱自己因做性別研究在美國找不到工作。回台任教社會學系之後，繼續性 / 別研究之餘，她也做了不少國族主義、跨境遷移方面的研究。對此，她認為，人類學者可以發展跨學科參照視角，將人類學的古典關注與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視野下的社會結構、社會變遷問題相交織。

現任教師動態：
彭立沛老師專訪

撰文 葉庭瑜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的系主任彭立沛老師，也是本所的合聘教授之一，其實學術背景和工作經歷都與城鄉所的跨領域規劃專業非常相近，大學與研究所都就讀建築系，本所林家暉老師也曾是他的學生；而彭老師又是如何從建築、規劃的歷程中發掘對社區、農村、環境的關懷呢？編輯採訪完彭老師之後，深感這或許不是一個天之驕子的一帆風順，卻是如你我般，有過掙扎與迷惘、困頓與磨難的常人，而正是這種塵世風浪中滋養出的胸懷，最是貼近社會上需要關懷的人們。平凡中見不凡，是不會被電影或傳記銘刻的小事湧流成河，最終成就今日寬廣江海。

以建築為起點，走向社區與農村

出身花蓮的彭老師，有著天然對環境與土地的熱愛與關注，中學時期便非常喜歡畫圖，常常沈浸在繪畫的世界中，兩耳不聞窗外事。大學聯考考上氣象系，而後機緣巧合之下進入建築暨都市設計學系，可說如魚得水，也在這裡發掘了自己的對建築的興趣。從大學到研究所之間，彭老師意外經歷了有趣的實務經驗，他在陸戰隊當兵時因為畢業於建築系，而有機會設計兵營宿舍，退伍前找到軍中庫房而有獨立空間畫圖、唸書，而順利考上了成大建研所規劃組。回憶起研究所的初始階段，令彭老師印象深刻的是研一的橋頭新市鎮規劃，順應當時的造鎮潮流，是第一次從生態、藍帶等角度去思考一個都市的樣貌，雖然是龐大的工作量，卻也樂在其中。

在那個建築行業仍十分景氣的年代，房屋工業化蔚為流行，彭老師的指導教授便精於此道，但當時台灣營造產業的施工品質並不能夠完全復刻日本講究標準化的預鑄工程，於是彭老師與同學們便紛紛投入集合住宅的研究。對住宅機能空間的分析其實與建築計畫息息相關，可說是空間標準化的第一步，了解空間的構造與技術層面，接下來才能追求成本與效益的平衡，而這方面研究的最終關懷則是讓大家都買得起房子，頗有「願得廣廈千萬間」的胸懷。本著如此心境，研究所期間便考上建築師執照，彭老師畢業後進入了建設公司，他笑稱自己當時沒有遠大志向，單純只想盡快投入就業減輕家中負擔，但卻發現斤斤計較地計算樓地板面積、核對法規與自己學的設計理想大相徑庭，也讓他領悟到賺錢對自己而言不是最重要的。彭老師憑著一股對資本市場制度的叛逆與衝勁離開了，轉往建築事務所就職，累積了數年經驗後便決定自己開業。然而遭逢經濟不景氣，建築行業也跟著急轉直下，這或許是彭老師人生中的重大轉捩點，讓他在大學同學、老師媒合下，重回文化建築系，開始了日後的教職生涯。

對彭老師來說，教書是一件快樂的工作，在文化的六年間恰好經手執行內政部營建署

的城鄉新風貌計畫，在一次次與顧問老師們造訪在地的旅程中，彭老師慢慢地對社區營造、由下而上、居民認同等議題有了自己的體察，也從旁觀察到台灣空間與社會的問題。從這個寶貴的經驗中，讓彭老師將地方認同訂定為博士研究題目，以此申請上東京大學。在指導教授大西隆門下，進行自己有關社區與認同的研究，期間也與山崎亮等學者同門，西村幸夫則是彭老師博論的口試老師，而對都市設計、社區設計等領域有更多深入探討。不過彭老師的興趣仍著重於非都市地區，從在成大研究所時的新市鎮計畫一路走到社區尺度，讓他能夠更細緻地觀察自然、空間、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畢業回台後，恰逢台大生傳系空出職缺，彭立沛老師自言很意外研讀規劃專業的自己，會那麼快脫穎而出受到錄取，或許是難以捉摸的因緣巧合，在背後默默推著每個人走向今日的模樣；然而更是受到當時農村窳陋老舊需要活化的潮流影響，彭老師以他對非都市土地規劃的深入研究為生傳系帶來空間專業知識，也延續前身農推系的社區發展脈絡，是機緣，也是水到渠成的共好。

讀農業農民農村：從森川里海看見生態循環

對於台灣的農村規劃，彭老師認為長期處於 minus 的地位，學規劃的人大多注重都市計畫，卻忽略了城市之外廣袤的農地。為什麼農村可以沒有規劃？這正是彭老師的關懷出發點，反思都市計畫最初的考量也是公益性，公共安全、衛生、合理的土地利用與經濟發展，然而非都市地區幾乎像是被社會所放棄，以照顧農民之名，卻產生許多中飽私利之實。農業無法有規模地開展，農地不停地被切割至破碎，造成今日我們看到的台灣農地景觀。彭老師強調，在談所謂城鄉發展時，農村的問題不可忽略，現在卻一直站在都市計畫的角度看整體國土的利用，其實農地與整個環境資源，才是這個國家的大部分。

彭老師以日本「里」的概念，講述日本在固有的環境條件下，學習如何與自然和諧共處——從森林中流向大海的河川沖積成平原，人們便在這山與海之間的土壤上打造一方天地，從周遭環境裡或取所需資源，四季循環，相互依賴，形成共生的自然生態。然而當人們生活因為科技發達，工業產品取代了那些取之於自然的器具，逐漸遠離生養自己的原鄉，原本的循環與規律便被破壞，廢棄的土地開始衍生問題。以農地來看，化肥、農業皆嚴重地影響著生物的棲息，生態鏈中更高級的動物也逐漸離開，人與自然的關係一點一滴崩解，再也無法歸故里。從山林到海洋，森川里海講述的是一個循環的流動，如何維持住一個地方的生態系，如何維繫人類生活的里與其他自然要素的共榮關係，其實是整體地球永續的問題。也因此農業不只是農業，也關係到遠方的那一棵樹與那一隻飛鳥，也與土地利用關連至深。

回顧研究所時做的新市鎮設計，彭老師深感一個城鎮的長成是現在進行式，遠非一個稚嫩的學生可以全盤兼顧，而台灣也不是極權國家，市鎮無法說造就造，在完全不同的經濟資源與政治體制下，不見得適合去做那種抹平重建的造鎮思考。然而不在非都市地區做新市鎮不代表不需要農村規劃，當農村被放任地生長，一來影響糧食安全，二來也形成各管各的、只在乎私利的思維。為什麼要有規劃、要有都市計畫，思考的是共同生活人民的公益與安全。而對於現在還在進行中的大型開發，必然都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是政治、經濟、權力的角力結果，其存在必然合法，然而彭老師點出，關鍵在於過程是什麼？規劃需要共同的參與和協力，缺少了這些過程，就只是指定與被指定的不可逆關係，需要顛覆的是決策過程，若等塵埃落定才做出批判便早已來不及，這些不永續的惡果將持續影響下一代。

最後，編輯請老師分享近期研究方向與課程規劃，彭老師長期開設區域發展與文化

景觀兩門課，在生傳系也一直有社區營造的課程，歡迎城鄉所上有興趣投入農村社區議題的同學修習。而近期研究著重在討論利害關係人與區域的關係，探討相互存有利益關係的群體或個人之間，如何彼此協力、協調出新的成果。彭老師也再次強調,規劃是協力的過程,與社會網絡之間有深重關聯。此外，老師的研究也長期關注環境治理與資源，正如先前討論的開發案或造鎮計畫，其實背後決定的是治理關係，因此必須把眼光投向更上位的法規與管理層面。本次訪談除了將彭老師介紹給城鄉所師生之外，更寶貴的是彭老師分享的農村視野、農業發展與生態關懷，當我們討論各種都市計畫、都市化理論時，也應當等重地思考農地規劃問題。正如彭老師所說，構成台灣土地大部分面積的是這些非都市地區，而農村問題也將透過循環，影響著身處都市的你我，關心農村，或許便是那條能夠找回失落故里的歸途。

卸任教師動態：劉可強老師專訪下集

從此，大家都過著快樂生活，嗎？
——劉老師談樂生抗爭歷程

撰文 葉庭瑜

本期卸任教師專訪延續上期與劉可強老師的對談，非常感謝劉老師主動提出願意談論樂生療養院的參與經歷，讓我們看見鮮少被新聞報導提及的細節，也與本期禮納里強制拆遷主題有所呼應。與禮納里的表面上的違建爭議略有不同，在樂生經驗中，更直白地揭露了少數族群的利益如何不斷被國家機器以公益之名而犧牲，這樣的規劃正當性何在？留下的創傷就像樂生那片山坡開挖後的地貌，不可忽視亦無法磨滅，又該如何治癒？

千層陰錯陽差，萬般無可奈何：樂生何以走向今日的懸置

劉可強老師的參與始於 2004 年，然而樂生療養院隱而不揭的問題，早在二十年前捷運新莊機廠畫下選址的那一筆時便初見苗頭。捷運機廠的基地最初訂於輔仁大學後山，劉老師也表示，樂生這塊位於山坡腳的土地於工程上絕非最佳選擇，當年就連台北市捷運局也不認同這個結果。然而不知是出於土地開發價值的考量，或是因為對徵收難易度的評估，最終在蘇貞昌擔任台北縣長任內，決定了樂生未來十數年的艱辛風雨。基地開挖後，陸續拆除樂生園區內不少建築物，是否保存或指定古蹟的攻防終於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時任政務委員的林盛豐便請託劉老師，幫忙找尋能夠共生的解決方案。原本蓋完新的醫療大樓後，預計拆除整個樂生療養院，並將院民全數遷入大樓中，但當時社會已對樂生多有關注，劉老師認為那時的氛圍仍十分正向、樂觀，對於保存樂生有著高度期待，也能同理院民們的處境。在社會與政權的角力中，劉老師最終以單純技術的角度提出兩個方案，其中之一便是現在青年樂生聯盟（下稱樂青）與院民們持續爭取的大平台。

當時捷運局已認同兩者都可行，雖然另一個隧道施作的方案成本較高，但也表示只要行政院拍板定案，便會按照結果來施行。可惜後續的事件並不像此次捷運局的首肯這般輕易，恰逢——或者該說不幸碰上行政院內閣換血，林盛豐政委跟著院長游錫堃一同請辭，臨去前並沒有為樂生作出最終決議，樂生保留自救會與樂青只能持續不斷地奔波於新莊與政院之間，努力爭取院民的最大福祉。後來在公共工程委員會討論時，劉老師與城鄉所同學也曾提出比較保守的方案，只求讓院民能夠順利出入，卻長期沒有結果。或許正是不斷的挫折，讓這個運動越滾越大，也讓樂青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新人加入後跟著前輩參與抗爭，自己又再成長為下一代的領導，劉老師認為這是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非常重要且令人動容的現象。

強權不止，反抗不休，雖然捷運新莊線 2012 年在機廠未完工的情況下通車，也證明了捷運局以往反覆強調的「沒有機場無法通車」說法只是無端挑起對立，但工程仍得進行，樂生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時序來到 2016 年，隨著捷運工程即將進行至尾聲，樂生入口如何該重建的討論再度回到檯面，當時由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老師主持協調，召集了文化部、交通部、衛福部、公共工程委員為等所有單位共同與會。會議中各方達成共識，願意縮減最靠近馬路的五條軌道，讓大平台有足夠的空間能夠實現，捷運公司也點頭接受減軌後的兩分半鐘發車時間。這場會議的後續，在諸多有關樂生的報

▲劉老師與喻肇青老師十多年前在文化部門口抗議。

導中亦有著墨，那就是捷運局會後不承認此協議，樂生的冀望又一次落空。然而為何導致這樣的結果，甚至連會議記錄都不得公開？劉老師說明，其實會議上同意減軌的是負責營運的捷運公司，而捷運工程局代表會後呈報給上司時卻遭否決，堅持兩分鐘發車的設計標準，認為公司代表發言不當，並對國發會施加壓力，要求不能提供會議紀錄。一直到好幾個月後，樂生這一方遲遲未見結果，才發現當初的允諾早已被推翻，而等著他們的甚至是比延宕更難以接受的後果，也就是如今尷尬地施作到一半、卻抹煞了院民深與厚望的大平台方案的那座斷頭橋。

有關建橋始末，並不只能一筆帶過，說捷運局不管不顧地粗暴強建——粗暴是真，強建也是事實，但背後的權力運作痕跡與官僚組織意圖收編的邏輯，或許更是必須細細思量之處。被劉老師稱之為烏龍的斷頭橋始末，是起因於社會抗爭日漸激昂，捷運局為了暫緩壓力，便委託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進行樂生院區的建築調查，不過究竟是真心於文資保存或只是想摸頭，亦難以斷言。但劉老師提到，這個委託案並不包含出入口的設計，僅涉及歷史建物調查，學會卻在研究過程中意識到動線問題必須處理，因而額外提出了 Y 字型陸橋的提案。此筆委託案的經費來自於捷運局的「回饋」，從工程款中拿出一點零頭，意圖安撫抗爭的樂青與自救會，而結果或許大大出於捷運局意料，立即按照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的規畫案，開始興建這座橋。

確實這座橋的設計，仍擷取了樂生療養院過去因隔離動線而導致的 Y 字型入口意象，相似的Y字也見於劉老師的平台設計中，但對劉老師而言，單單將此元素提出卻不見緩坡，甚至做成不方便院民出入的動線，遠

▲2017年4月29日為樂生上凱道之時的照片。

▲2017年4月29日在凱道上搭建了一個大平台。

遠稱不上一個好的方案。學會雖然好意行份外之事，卻給了捷運局見縫插針的機會，沒有與院民溝通、也沒有好好思考橋行至盡頭要如何下到地面，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撥款動工。而更離譜的是，捷運局蓋完了橋體，便認為過了地界線便屬衛福部的責任，該如何從橋上下到地面，也就是最重要的垂直動線，被捷運局以令人目瞪口呆的無賴姿態置之不理，甚至認為建造了橋體已經是回饋院民，其他事情便不需要理會。至此斷頭橋已成定局，過往的努力簡直付諸流水，而後衛福部另外委託其他公司進行設計規劃，想解決被遺留的垂直動線問題，但至今仍無法提出符合院民需求的解方。去年中，樂青再度向衛福部陳情抗議，終於在七月取得法律攻防上的小幅勝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決訴訟結果明確前，衛福部必須暫停執行入口景觀工程。沒想到衛福部無視司法判決，強行舉辦開工儀式，為了表現政治成績，將司法權威與人民訴求扔在地上踐踏。經過了半年時光，直到訪談劉老師時，暫緩執行的時限已至，衛福部也依然沒有提出新的方案，持續進行的只有捷運工程，而事關院民每日進出活動的坡道設計仍毫無改進，更遑論自救會持續爭取的緩坡大平台。

樂生未來何處去：讓那些不可見之物被看見吧

現在，從捷運迴龍站出站後往樂生療養院方向眺望，就能看見斷頭的橋面突兀而尷尬地高掛半空，預鑄的鋼骨結構與水泥柱墩像是地底巨獸的尖利牙口，張嘴吞噬數十年

▲2017年4月29日在凱道上搭建了一個大平台。

間院民熟悉的歸家路途。捷運局與衛福部自以為是地認為只要有了無障礙坡道與電梯便能符合他們想像中的使用需求，但當真正的使用者站在面前提出訴求時，卻充耳不聞，自行其是。樂青與自救會持續以「樂生完整重建」為口號，向捷運局與衛福部持續要求恢復緩坡大平台方案，然而橋體已然落地，縱使是半成品，也幾乎不可能說拆就拆。劉老師則認為這個訴求未來已經很難達成，就連捷運局允諾要異地重建 2008 年拆除的房舍，很可能也只是國家權力用來虛晃一招的手段。

院民們逐漸老去、凋零，等待著他們的不只是入口緩坡的工程問題，衛福部卻無視自己過去的承諾，再度把文資保存當作收編的手段，不斷以修繕房舍的名目要求院民遷入新的樂生療養大樓。劉老師表示，就如同寶藏巖一般，政府介入文化資產的修復或保存時，總是帶著官方觀點的期待，而之間與院民自身的期待的落差，仍有待樂青一點一滴地從中對話、協調。以樂生的經驗來說，對於過去二十年間，政府跟民間的關係是否在文化資產保存的過程裡變得更成熟，劉老師仍持保留態度，因為政府或部分文資團體更在意的總還是具體可見之物，有時過度在意空間或建築的留續，反而放任真實的人與生活的樣態，逐漸消磨在時間的長河中。正如衛福部的作為所揭示的，僅只對外委託了建築物的調查與保存，卻不把重點放在如何呈現或保留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漢生病歷史、院民的生活、地方情感的凝聚，這些珍貴的無形之物卻被驅逐，我們無法將社會網絡和情感聯繫關進如鐵籠般的醫院病房，卻又天真的冀望它們不會漸漸坍縮成冰冷的標本。

那麼樂生的抗爭，在本世紀初凝聚起巨大的社會共識，也成為台灣社運史上一到深刻的紀錄，難道只能煙消雲散

嗎？其實劉老師回顧樂生超過二十年的抗爭歷史，並不認為結局必將走向無奈，而是對過程抱持著高度肯定，尤其是樂青這樣的運動團體的出現與延續，以及期間號召出的巨大社會動員力，劉老師認為都是珍貴的資產。此外，樂青目前除了持續抗爭訴求外，也將把樂生保存的方向轉往非物質遺產論述，希望能完整地把院民的故事記錄下來，讓社會看到曾經生活在這一方天地裡的人事物。從2020年底，樂青恢復了樂生大學講座活動，除了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演講之外，也有與院民為師的課程，讓院民直接成為大家認識樂生的領路人，而不只是螢幕裡會說話的NPC。

樂生大學的開設，固然是非物質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對策，卻也是修復社區關係的良藥。劉老師回憶，在十年前的樂生抗爭運動中，曾十分努力營造與在地居民的互動，夜間或週末常舉辦給小朋友的活動，周邊學校的老師也會帶學童參加，讓樂生的影響透過青少年帶回家庭，擴散到成年群體中。其實在漢生病的隔離解除前，院民們有一套自給自足的微型農業體系，現在已不存在的山腳曾有水塘與菜園，也可以飼養雞鴨；而當治療起效、不再會感染之後，隔離正式走入歷史，院民便將這些蔬果在週末市集上販售給周邊的居民，雙方形成互利共生的良好連結。後來一來因為工程開挖，也因為越來越多的城鄉移民遷入新莊地區，難免對漢生病有更多的遲疑與防備，社區網絡就這樣漸漸地被淡忘了。而現在的樂生大學，與十多年前的課程有著同樣企圖，都希望能補強樂生與鄰近社區的關係，讓樂生的故事不只活在文字中，更活在人們心中。

當橋樑落地、大平台希望渺茫，當初拆除的建築也難以修復重建，社會幾乎因為看不到抗爭的希望而失去關注的動力，此時需要的或許是一個新的方向。對劉老師而言，他並不認為當今社會的這一代缺乏熱忱或改革動力，但當事件已延續二十年，社會動員確實辛苦，看不到抗爭的可能性難免令人卻步。因此要如何讓漢生病歷史、院民的生活點滴等看不見的東西，被有創意地呈現出來，這些非物質遺產的存續與展示將會是未來樂青的努力前進的目標。

以公益之名：為了誰規劃？

自樂生建立以來，長期都在公益的名號下蒙受壓迫，從 1930 年代起為了防止疾病擴散而強制隔離，到上個世紀末因興建捷運而開挖拆除，最後又在文資保存的大旗下，仍持續推擠著院民遷入他們無法稱之為家的新大樓。似乎一句輕飄飄的「公益」，便能遮掩有人因此受害、流離、心碎到無可縫補的事實。規劃專業強調的多數公益與少數群體之間，是否必然如翹翹板般，一方高高飛起的同時卻是另一方的沉沉墜跌？對此劉可強老師回應，許多較為棘手的課題，如都更、違老重建等，其中都有這樣強勢弱勢的角力，其中一種規劃，是用照顧、施捨的心態去照顧弱勢，總是強調新的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對所有人都有利，基於個人的關懷（或許也是一種自我滿足？）才給予恩惠；而另一種則從根本上不認同這種給予的方向性，認為無論強勢或弱勢，在社會上都應享有同等地位與權利，生存本身便有其固有價值，不需要任何人來肯認。像樂生這樣的議題，捷運的建成當然施惠眾多，也不可能直接反對捷運興建，但為了交通運輸便利而犧牲某些人，樂生院民們基本的權利又何在？有時「公益」一詞，太容易輕率地與大多數人的權益劃上等號，但若總以多數為重，那少數群體的主體與主權便永遠不被看見。

另一方面，劉老師也強調，當把資源和權力握在手裡時，用什麼姿態去面對與自己不同的人，更是關鍵。劉老師提出，在傳統自由主義思維下，盛行的便是上述前者那樣「我優先得到，再來照顧你」的心態，因此比如社會住宅、低收入戶補貼都有如此問題。當今更因為全球化進程鋪天蓋地，讓這種態度當頭籠罩，也才會出現像是第三世界這樣

的名詞，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不斷強化強－弱／給予－接受的關係，最終導致種種亂象。而台灣無論執政黨違和，對待少數的姿態也如出一轍，正如原住民政策，居高臨下地認為提供教育、住屋便是行善，卻不知每一個動作都為有損原住民的主體性，一點一滴地侵蝕珍貴文化。

那麼當規劃者已經已經站上這個位子，又該如何警醒自身面對不同群體的態度？劉老師則回應，在學習的過程中更回到自我反省、更認知到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回到這個出發點再去思考能做以及該做什麼事。規劃專業多數時候確實是得要決定一個答案、提出一個設計，而劉老師以好茶部落的例子，說明答案其實有更多可能性。二十年前好茶部落第一次被指定為古蹟時，政府委託基金會進行建築保存調查，但劉老師當時就認為我們不是部落居民，外來的人再怎麼做研究，也不會比住民更了解這些房子的價值與故事。留下圖面、資料其實都是次要的，社區裡最重要的課題在於部落的小朋友已經不會說母語，因此當時便把經費用來舉辦假日的母語小學校，讓年輕老師回鄉教授，延續文化。過了十年再度受到委託，但房子跟原住民的生命經驗是深深相連的，誰來說那些故事、房子由誰來修繕、我們做了測繪調查意義又何在，都是需要謹慎思考的問題。不過後來或許該說有幸，因政府部門預算不足，好茶部落又逃過一次被修建的命運。最後第三次委託案，因好茶受到國際關注而壓力也相對增加，於是劉老師與基金會便提出把資本門的預算變成經常門的運作，讓這些經費轉移到活動的舉辦，訓練部落年輕人做修繕工匠。這就像學母語，如何去砍一塊木頭或削一片石板，必須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來說自己的故事，建築的修繕才是有意義的修繕，而不是一齣為了外來者自己，將進行中的樂章凍結成破碎音符的悲劇。

最後劉老師講述的好茶案例，正如樂生一般，體現政府介入的角色舉足輕重，也是居中的規劃者不可迴避的大課題，需要一點一滴去面對。而劉老師多次提及的自我反思，也令人想起電影《一代宗師》中著名的台詞——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但空間規劃專業似乎總是教導學生遠眺無邊天地、心繫繁沙眾生，世界上有著這樣那樣的問題等待我們卻解救，有時卻忘了回首凝視自己。我們真的曾看見自己嗎？一葉障目，又如何見他人？樂生的抗爭或許暫告一段落，即將啟程走往新的方向，而這個問題，仍留待規劃者的回答。

更多相關訊息，請參考法客電台 Podcast 與樂青的專訪：
法客電台｜樂生爭議再起 人權、道德與公共利益如何平衡？

芮光曄

堅持初心，參與式規劃設計在中國大陸的砥礪前行

訪談時間 2020/09/13
受訪者 芮光曄
訪談 整理 姚麗金

芮光曄和黃潤琳是城鄉所畢業陸生裡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正在大陸踐行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校友。一年多前，他們來城鄉所分享過他們在廣州泮塘五約的參與式規劃經驗，說實話，非常動人。幾個月前本想邀請兩人一起受訪，沒料到那時潤琳正住院，不方便訪談，於是就約曄子姐來了次深夜分享。

城 來城鄉所的契機是什麼?

曄 念城鄉所之前，我已經在華南理工大學城市規劃專業念了一年研究生了。大學畢業後去廣西桂林當了一年志願者，去了很多村子，反思了自己的專業所學，慢慢覺得其實自然而然的東西挺好的。後來回去念研究生，每天都在趕不一樣的規劃項目，不一樣的設計，我不知道我在為誰做設計，就比如我做一個公園設計，我不知道我的使用者在哪裡，可能看一圈場地，就把設計給做了。規劃是一個權力很大的專業,我在電腦上畫一條線過去，可能就會涉及到拆別人房子。我覺得我經驗淺薄很心虛，做不了這些事，就漸漸找不到繼續做規劃設計的理由了，所以當時的狀態不太好。

後來機緣巧合來了台大城鄉所。發現城鄉所“參與”以及關注“使用者”的理念回應了我先前的自我質疑，所以雖然在城鄉所念書辛苦念，但我覺得很開心，收穫滿滿。

城 學姐在大陸嘗試實踐了不少參與式規劃設計，想知道其中的淵源。

■論文上的嘗試

曄 上過王老師規劃與設計史的課的同學就應該知道規劃設計有很多方法，參與式規劃設計是其中的一種取向。而這是我那時候在大陸念書時沒有人提過的，所以城鄉所念到一半，我需要回廣州華工畢業我那邊的碩士學位，需要寫碩士論文時，我就想寫一下在臺灣接觸到的這些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案例，可以和大陸的老師和同學們交流探討。但寫的過程中覺得很多東西沒有理解清楚，所以懷著進一步弄清楚參與式規劃設計內涵的心情，我的台大的碩士論文就轉而去研究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分會（後來變成了潮間帶），何以支援他們持續開展參與式規劃設計二十年。寫論文的思辨是一種收穫，而寫論文背後也有許多的收穫；當時寫論文的時候，陳育貞老師給我介紹了三十多個訪談對象，透過與不同人的訪談過程，我看到了三十多個堅持目標，踏實生活的人生，而這對我，也是另一種激勵。隨著論文思辨的過程，我也逐漸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內涵價值更加認同，我逐漸覺得，這是我相信的事，這也是我以後一直想要持續嘗試的事，雖然也許過程會很艱難。

■一個人做不成參與

曄 我 2016 年回到大陸，那時候的大陸對參與式規劃開始有一點點啟蒙的認知，不過就規劃設計行業的整體氛圍來說，尚沒有普遍的認識，包括到現在其實也沒有太多人有這方面的認知。

剛回來的時候，我也面臨要找工作，我當時沒有想清楚自己做什麼職業，但是我想清楚了自己不要幹什麼——（1）不去房地產公司，因為價值觀不合，我不想為資本積累打工（2）不去大的設計院，我有我想要嘗試的事情，比如說參與式規劃，但這些在大設計院的體制下有點難突破。除此之外的選擇，都可以。所以畢業之後我選擇加入了一個民營的小設計師事務所（廣州象城建築設計諮詢有限公司），它的背景是華南理工大學的建築歷史研究中心，和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為什麼選擇歷史方向？因為我覺得歷史文化保育是跟人與根植在地的故事密切相關的，而這會是做參與較好的基礎；就好像如果是開發類的專案，人都沒有了，參與就更難了。

可我剛畢業的時候，我一直對公司講有些專案需要做參與，但是他們覺得這個環境可能並不能支持我去做這樣的事情，所以他們就說你可以再等等，有機會在嘗試。所以剛回來的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做參與的事情，是很難的，我想要在傳統規劃項目裡嘗試開展參與事情的時候，我發現一個人做這件事情是很辛苦的，很容易打退堂鼓，跟陌生人接觸的時候會怯場，累了也會打退堂鼓，尤其在廣東又是說粵語的，而我並不會說粵語。

曄 而後機緣巧合，我去了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環境設計系當老師，但跟象城建築也持續有一些合作。後來一直到 2016 年底，象城說有一個在潮州潮汕項目，可以讓我們嘗試做參與式規

▲芮光曄和黃潤琳在城鄉所。

劃。當時黃潤琳也快畢業了，我就跟他說“你不要找工作，你過來我們一起弄”。黃潤琳也是認同參與的價值的，所以我們就一起開始了第一次嘗試；但很可惜，這個項目最後有一些原因，合同沒有落實，算是沒有結果，也有一些操作上的教訓。但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情，讓公司認識到我們做參與的價值和潛力在哪，於是雖然潤琳不是空間專業出身，但也因為潤琳能做參與的特質，就讓潤琳成為了象城的正式員工。所以他和我就一直在象城的支持下，開始做參與式規劃的多方嘗試。

曄 我們兩個應該也是城鄉所畢業陸生裡面為數不多，現在在持續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的人。參與式規劃設計是城鄉所在主推的，但真的做第一線實踐的人其實很少。我曾經和公司表達過“不然我把教職辭了，就來專門做參與好不好”。但公司說，他們只養得起一個人專職做參與，他養不起第二個人，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參與式規劃設計至今在大陸的規劃設計行業都是很小眾很小眾的。

城 為什麼大家都不願意做參與?

曄 你可以等你畢業了再來想這個問題。我覺得大家都沒回來做參與，一方面可能沒那麼認同參與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大陸做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支持是很少的，這種支持少不僅是政策方面的支援，還有資金、社會認知等各方面的支持；我們做的廣州泮塘五約微改造的社區參與的事情，是象城建築願意拿自身的設計費倒貼支援我們來開展相關工作，這種現象在空間設計領域尤其明顯；但如果你去社工領域，那還是有一些支持的，但我們並不是從社工角度出發的，我們是從空間設計的角度出發的，所以還是有一點差距。

我和黃潤琳一直到 2018 年，在泮塘做出了一些社會影響力，佛山順德的一個基金會看到了我們做的事，他們願意出資支持我們在順德的碧江社區開展關於參與式規劃設計的事情，而這是我們做的第一筆有資金支持的參與式規劃設計項目。因為碧江做的也比較好，得了順德的社會創新獎，於是在今年，順德的另一個村子“杏壇”的書記，就請我們用參與式的方法協助杏壇的社工開展歷史復原研究，這是我們有資金支持的第二個項目，我覺得有資金支持是很重要的事，它讓我們的努力可以可持續。

從2016年回來，到2019年，我們用了三年，才讓參與式規劃設計進入了可持續開展的狀態。2019 年開始，我們的步伐是一年做一個項目，這個工作量和回報率是很難養活我們自己的，所以我們還必須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我還要教學當老師，要做一些科研，前幾年是比較痛苦的，因為教學是教大學生很基礎的東西，與我在做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實踐有點難銜接，我也在嘗試銜接，但目前還沒有接上。如果實在結合不了的話，那我也可能考慮捨棄一部分工作，不過前提是當參與能持續養活我，撐滿我所有工作時間的時候，我才會考慮這事；如果參與還是這樣一年一個項目這樣做的話，可能還會把教職當作主要經濟支持。

但無論如何，我們是在讓自己做的事情慢慢進入正軌，讓參與可持續的開展下去。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預期後面會怎麼樣，但還是要慢慢去做事情，慢慢累積相關經驗，總是要有這個過程。而我們做的事情也會開始不斷有一些正向的認同與回饋，這讓我們覺得雖然做參與很辛苦，但也很值得，最滿足的是，我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城 有沒有考慮過團隊壯大這件事?

曄 團隊要靠錢來壯大。只有當參與的項目每年達到 5 個以上的時候我才會考慮請人。並不是說像你想像得這麼樂觀，我們越做越好，口碑越來越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來找我們。然而並沒有。一年能有一個兩個已經很不錯了。大家能有這方面的意識，看得懂我們在做什麼，並且願意來嘗試的人其實很少。有的人可能看得懂，但是覺得很麻煩，不願意

做；有的人可能根本看不懂；有的人覺得見效長，不想花那麼久時間，也不想動員一般的居民。廣州市雖然把共同參與、共同締造當作政令來號召，但並沒有真正在做這件事，只是說說。雖然大家都說參與好，但都是停留在嘴巴上。真實去做的時候，總是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會有很多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是很難接受的。

▲芮光曄和黃潤琳在象城設計。

城 談到就業，有同學比較迷茫，你的建議是什麼？

曄 我的建議是想不清楚自己要幹嘛，那就先想清楚自己不要幹嘛，排除這些之後，剩下的你都可以幹了。王志弘老師曾經說“混沌之中，最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的價值”。我是因為想清楚自己要幹嘛，但是不知道具體的路怎麼走，所以我知道遠處有一盞燈，但是我看不清腳下的路，我會朝著那個方向去走，那就是我的目標。但是如果你沒有那盞燈，那你就只要把自己不想走的路排除，剩下的路不都可以走嗎？

城 如果時光倒流，想對當時在城鄉所讀書的自己說什麼？

曄 好好玩啊。好好去體驗各種各樣的東西，珍惜能在台灣的時間，多看看，多走走，多和台灣朋友聊聊天。我們這邊和台灣的體制是不一樣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認識也是不一樣的，要多去和不同的人聊天，和不同的人去接觸，去不同的地方，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但最後一定要是相互尊重的，你堅持你的認知和想法沒關係，但要去瞭解別人的想法，尊重別人的想法。

在台灣的歲月，從我現在回頭來看的話，是我人生中很難得的很濃墨重彩的一筆，是我價值觀的形成期，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篇章，但這是我的機緣，每個人的機緣可能會不一樣。無論如何，每個人生階段，就做那個階段要做的事情，而每一件事都是有價值的。

▲更多項目資訊可掃碼了解。

城鄉所的學習，從離開城鄉所開始

陳瑤琳

訪談時間 2020/09/10
受訪者 陳瑤琳
訪談 整理 姚麗金

陳瑤琳現在在美國念社會學碩士，從城鄉所畢業，回大陸工作了一陣之後才去的美國。做研究的日子很忙，從早到晚。談到疫情對生活的影響，她說其實可以忽略，因為本來也沒時間出去玩。雖然現在念的是社會學，但瑤瑤仍舊心系規劃。於是，不自覺地，這次訪談主要就圍繞規劃與社會學專業之間的糾纏，以及博士研究生活展開。

城 你大學和博士念的都是社會學，碩士班念城鄉所看起來還挺特別，可以講講其中的淵源嗎?

瑤 應該說我一直對社會學很感興趣，但我沒有把它作為我未來的職業選擇。我大二的時候就開始很喜歡城鄉規劃了，我就去旁聽相關課程，我覺得很有趣。大三我去台灣交換了，有一個老師私下給我們幾個一起交換的大陸學生開了規劃課，陸陸續續聊了一學期，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好，於是就決定申請城市規劃專業的碩士。但當時還沒有想要申請哪些學校，只是覺得可能可以考慮美國、香港、台灣、日本。後來大四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神奇的學長，他給我推薦了王志弘，看了一些資料，深受啟發。那一年，夏鑄九老師來我們學校做客座教授，有開一門講社區發展案例的課程，我有去旁聽。

瑤 城鄉所知道的比較早，因為我們學校（南大）和台灣的合作比較多，然後我又很關注城鄉規劃這塊。那時候很流行龍應台，看的書裡有寫到寶藏巖和城鄉所。當時只

是知道這個地方，但是印象不深刻，然後大二的時候又有老師提起，大三去台灣交換，一直到大四遇到那個神奇的學長，城鄉所這幾個字，包括對老王的印象越來越加深。不過最開始是因為想去旅遊。

城 你談到去規劃公司的經歷，想聽聽你對大陸的規劃公司的看法，還有一個問題挺好奇，大家畢業之後會選擇去規劃公司嗎?

瑤 如果你實際去工作的話,在規劃公司的話，你是接觸不到人的。我們城鄉所畢業的陸生在規劃公司的人其實不多,大概3-4位，而且他們不在體制內，他們都是在規劃公司。芮光曄和黃潤琳是在一家公司，張和強在深圳規劃院。

有兩個女生去了建築公司，我的話是選擇繼續讀書。我現在在念社會學，但我最想做的還是都市研究，正在嘗試把社區規劃和都市研究的方法囊括到我的論文裡面。

城 徵集問題的時候有朋友在糾結就業選擇，是去小城市規劃就業，還是大城市打拼?規劃專業就業和生孩子這麼選擇?想聽聽你怎麼看。

瑤 我對這個問題其實有考慮過，因為我是女生，然後我也結婚了。關於城市的選擇的話，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樣，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就到北京和上海都實習過，算提前體驗一下大城市吧。後來第一份工作在北京。我個人會覺得，城市的選擇或許，最好的辦法就是去體驗一下，生孩子可能沒法體驗，但孩子可以去抱別人家的，自己帶一帶。畢業之前，如果自己沒有過往在中國各類型城市生活和旅遊經驗，確實很難做出選擇去某個城市。

我自己可能比較幸運，大學的時候通過一些項目去了很多城市，又經常自己跑出去玩。一直到在美國前,我是在深圳和香港，我還是很喜歡大城市，讓我回到小城市，其實我也沒有辦法接受。很多東西會受到限制，比如在小城市，我是絕對不可能在書店裡看到老王的書的，因為我們那連靠譜的書店都沒有。

關於孩子的話題，尤其是在我們城鄉所這麼以人為本,又很關注性別平等的情況下，孩子的話題會比較特別，大家思考的方式會和其他人不太一樣。城鄉所很多時候的項目會特別關注老人和孩子，孩子通常也是做社區帶動的一個突破口。我個人對孩子的話題會比較慎重一點，個人選擇近幾年都不會生。但有些人會有其他選擇，包括我現在身邊很多同學都是一邊讀博，一邊生孩子。我個人不是很想要這麼操作。

城 其實我還挺好奇去規劃公司工作和生孩子只能二選一嗎?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瑤 在深規院的時候，我們部門所有坐在辦公室裡的女孩子都沒有孩子,無論年齡大小、是否結婚，當然高層是有孩子的，高層大概是六零後還是七零後。日常工作是，早上九點去，晚上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班，通常我們是十點多鐘。週末也會上個班。

我當時實習的時候是幫忙做總體規劃，但這個我沒有做特別久，大概只做了兩個半月，接近三個月。年底去實習的，後面就過春節了。當時去深圳的時候並沒有去到理想的團隊，當時想去的那個項目組是做老城改造。

城 本科非規劃專業的同學可以去實習嗎?

瑤 我覺得實習大部分人都會歡迎的，但能否轉正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要去規劃公司的話，你需要展示自己能夠做規劃的能力，通常有幾個操作方法，一個是考證，一個是展示技術方面的操作能力,比如說像GIS、SketchUp這些。你需要讓他們知道你學的是非規劃專業，但不代表你沒有規劃能力。Hr 確實也會

懷疑一點，他們對於社會學系、中文系、心理學系等等偏文學科的想像相對是比較窄的，也不太能夠確定說社會學是不是一定能夠去做規劃。這點是我選擇美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在美國，念社會學之後去做規劃是一個很大的優勢，我覺得在國內這不是一個優勢，反而要花很多時間去證明自己。

就業還是要看個人情況，無論是讀書還是找工作，本質都是一個探索自己的過程，你要先了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才能夠更好的把自己匹配到合適的崗位上。

城 有沒有有趣的就業方向建議?

瑤 我當時在國內面試 NGO 還挺有意思，他們就是做政府服務外包，幫街道完成項目。

大學裡做過 NGO 相關的工作，做的是農村教育。後來教育團隊也轉正了，成立了社會企業，做起了互聯網農村教育，比如通過互聯網的方式給鄉村的孩子普及音樂教育。不過我自己的 NGO 經歷止於 2015 年。

城 談談城鄉所對你的影響吧!

瑤 對我個人而言，城鄉所對於我的工作有沒有幫助，我不知道，因為在規劃界正式工作的時間很短。但對我個人生活的影響比較大。城鄉所的教的東西，包括它的學習方法，以及做研究的方法，其實就是一套價值觀，它可以應用到各種領域，不論你是做規劃也好，還是去其他領域。

城 對想要出國的同學有什麼建議嗎?

瑤 出國一定要考慮清楚自己的狀態是什麼樣的。比如你現在已經在台大了，當你坐在圖書館，或者坐在家裡，打開你的研究，這個過程，如果你做了整整一天，然後你覺得很開心，我覺得那會是一個很不錯的狀態。如果你做了一天的研究，你覺得很痛苦，每一分鐘都很煎熬，甚至或者可能只能堅持兩個小時，但是不能堅持更久的話，那就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想要讀這個，或者繼續讀書。

繼續讀書這件事付出的成本非常的大，無論是經濟成本，還是時間代價，身體代價，以及整個你的生活狀態，都會是非常大的付出，這跟你去工作其實差別比較大。

碩士和博士是一起上課的。就上課來說的話，其實壓力都很大。但是做博士的話，還是要做自己的研究，那自然事情也會更多。我們學校規定，每個國際學生每個學期要修 12 個學分（四門課），才能保證 full-time 的學生的簽證。我自己是因為最後一學期了，不用修這麼多課，再加上我要寫碩士論文，所以我這學期是修 6 個學分。其中一門課是 Urban Sociology，這本課的任務是每個禮拜讀將近 10 篇文章或者書本章節，同時需要讀一本書，要寫一個 book review，再做一個 presentation。每週都需要提交一頁 A4 紙的報告。另外一堂課上的是 Sociology of work，這門課是每個禮拜讀一本書，每個禮拜寫一個 review。每個月還要寫一個大的 review，小的 review 是 2-3 頁，大的是 9 頁，所以一個月要寫 13 頁。

城 花了多久時間在這些課上?

瑤 所有時間。我想說是目前這個強度不是很高，我目前所在的學校不是特別知名的學校，它就是一個美國州立大學的某城市分校。如果去到一個更好的學校，其實要求會更高，要讀的東西也會更多。無論你是學文科還是理科，理科論文的字數比我們少，但是他們要做的事情也並不少。所以要想清楚，真的要出來讀，並且你不想混一個學歷回家的話，可以衡量一下你願不願意這麼辛苦地去讀。我現在每天的作息是 11 點睡覺，6 點起床。我覺得每個人

是不太一樣的。有些人是半夜學習，有些人是白天學習，但是時間長度基本上就是從早到晚。

城 現在在國外的生活怎麼樣？疫情對生活的影響還會很大嗎？

瑤 對於文科博士而言，疫情對我們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還是在家看論文，還是在家寫論文。沒有疫情的時候，也沒有太多時間出去玩。對我先生而言，會有一些影響。他需要做一些實驗，大家也都知道疫情比較嚴重嘛，所以他的老闆也給他開闢了一個比較大的辦公室。他就在那個辦公室裡面一個人待著，做實驗。最大的影響應該是設備在公司，但他得 remote work，所以常常要去搬運東西。

城 最近關注的有趣的議題或項目？

瑤 Data science in sociology. 科技或者技術已經成為了美國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取向，無論是讀規劃也好，還是讀社會學這種很文科的東西也好，他也會希望你有些技術的背景。哈佛 GSD 今年還是去年做了一個老舊工業區的改造，我的朋友在那邊上課，他跟我說，哈佛非常形而上，非常關注人、文化、歷史這部分的東西，對於規劃本身的技術的話，會很看老師的取向。他個人會去 MIT 修一些技術方面的課。那我這裡聽到這裡的感受是，城鄉所的東西，其實非常國際化呀，但你把這些東西拿回大陸，實際運用起來，確實是有些困難。

我個人在做的研究是三個。一個是之前在城鄉所寫的碩士論文，我把它重新改寫成英文了。不知道會不會發表，反正寫好了，先交出去再說吧。還有一個在做的是移民研究，觀察在 Covid-19 之下，中國留學生的情況。

講到調研或者實地訪談的話，我之前還做了一個研究，深圳的一個工業村後來想要改造成藝術村，然後我去看他們改造的過程，以及改造對地方造成的影響。這是已經發表了的，在南京的一個學術會議。當時黃麗玲老師也在。我後來很關注旅遊方面的話題，藝術村是當時關注旅遊而順便看到的一個東西。

城 如果 20 天時間在中國亂走，你會有什麼推薦？（當時問這個問題是出於私心，因為筆者當時在大陸很想出去玩）

瑤 我以前在台灣兼職做過導遊，我看看能不能給你推薦點地方。就是一個不好好學習，整天做亂七八糟事情的人。（這樣不是很開心嗎）嗯……可能指導教授會很生氣。

重慶，貴州。如果你對城市發展感興趣的話，其實我還蠻推薦河南的，河南這幾年的發展很有趣，可以看看。因為疫情嘛，我覺得湖北也是可以去的。因為我是江蘇人嘛，我個人比較感興趣的是蘇北的幾個城市，和蘇南的一些小的城鎮，他們的發展脈絡和空間改變也是很有趣的話題。這幾年像揚州、南通、泰州、常州這些城市和上海之間交通的改善，其實發生了很多變化。像蘇州、無錫、嘉興、杭州、湖州這些，沿著上海，本來經濟條件也都不錯的，他們也都在努力更新自己的城市，做了一些空間改造，也是一些很有趣的可以拿來分析的東西。有的時候不需要做特別大，關注一個小的區域，一條街道的變化，也可以收穫很多。我們算很幸運，這一時期的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你能夠抓取的東西也非常多，但從哪個切面去探索生命議題，反而會是一個比較需要思考的東西。如果很粗略的去看待都市，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很值得研究。

城 略，聊了一些嘉興的情況。

瑤 桐鄉、海寧這些地方都很有意思。海寧經

濟不錯，但是存在感很低。還有烏鎮。如果你以城鄉所的脈絡來寫就會很有意思。你也可以研究嘉興的佈局，包括嘉善市、海寧市，村鎮佈局是這樣的，他們之間的發展差異是什麼樣的，桐鄉一直發展的不溫不火的，這些議題可以討論。從外地人的角度來看，嘉善縣存在感特別低，但所有人都知道嘉興的粽子，也知道烏鎮，包括粽子為什麼成為了嘉興的代名詞，這件事其實也是可以拿來研究的。嘉興其實有蠻多像你說的那樣，可以蹲在那裡研究的東西。

城 嘉善更像是上海的大後方，很多在上海做生意的，後來在嘉善買了房。。

瑤 因為離得近啊，它畢竟離楓涇鎮，離松江區那麼近。這個其實也可以拿來做研究，當它成為上海的後花園之後，對於他這個城市本身，這個縣而言，有什麼影響。

像宜蘭早期，很多人說他是台北的後花園，每次雪隧、台九都會堵車。一開始台九會堵車，台九會很危險，然後就開發了雪隧，但結果雪隧也很堵車。現在每天來往宜蘭到台北通勤的人非常多，那為什麼大家不願意從宜蘭搬到台北，還堅持這樣的通勤？為什麼在宜蘭找不到工作？

放到嘉善的例子裡，我覺得也是一樣的。會有上海人在嘉善買房子，但是他們會願意生活在嘉善嗎？他們能在那裡找到工作嗎？嘉善的教育怎麼樣？街道佈局怎麼樣？整個城市的構建是不是夠人性化，是不是適宜居住？光是嘉善的這樣一個城市定位你都可以寫很多。

嘉善也有高鐵站，其實是非常棒的一個地點。往中部和西部看，其實有高鐵站的城市其實不多。而嘉善是一個縣，它有高鐵站，包括蘇州下面的一些縣市也有。你可以看到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區塊來看，南方的縣鎮他的重要性和地位還是可見一斑的，這些東西其實也是可以拿來分析的，如果你要寫論文的話。

城 會給現在的學弟妹什麼建議呢？

瑤 最想講的話是城鄉所的學習，從離開城鄉所開始。現在在城鄉所的學習更像是一個能力汲取，你怎樣讓他們發揮能量，怎樣更好地消化它、使用它以及學習它，我覺得要離開城鄉所，脫離那個環境，才有更新鮮的刺激。

城 你想問城鄉所的老師或其他同學什麼問題？我們可以代為轉達。

瑤 我也很想知道別人在哪工作，不知道城鄉所有沒有搞一個畢業去向調查表，並給大家分享的？不知道這個事情能不能拿來分享。

每個人的生活狀態會很不同，城鄉所的人對別人的好奇都是帶有人文關懷的，並不是去八卦別人過的好壞。城鄉所的大家人生都很精彩，我很想知道別人精彩的地方在哪裡。每一個人的選擇都有他們的合理性吧，比如說有的朋友可能她的選擇就是想要一個小孩子，你去和一個孩子相處這件事本身也非常有難度。所以說也很好奇，她在這個過程中會分享什麼，會有一些什麼新的感悟。比如說將來有機會搞一個什麼城鄉所媽媽分享會，如何用參與式規劃的方法來帶孩子，然後我就可以分享如何用參與式規劃來談戀愛。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去規劃公司正經做規劃啊，但是你可以規劃自己的人生。參與式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一般情況下，人會經歷工作、戀愛、結婚、生子，如果你沒有沒法去規劃公司，那你其實可以在生活中用城鄉所教你的一些東西，比如生個娃，比如談個戀愛，比如和朋友和家人的相處。但是這裡又涉及到每個人對參與的理解不同，所以拿來分享很有趣嘛。

張和強：
不管在哪種體制下，做規劃的核心理念還是空間正義

訪談時間 2020/09/16
受訪者 張和強
訪談 整理 姚麗金

2017 年從城鄉所畢業之後，張和強就去了深圳市城市設計規劃研究院工作，主要從事城市與區域研究、國土空間規劃工作。訪談強哥是在去年 9 月的一個下午，那時他正在成都雙流機場候機，準備去新疆喀什做調研。他說他近來一直在從事的專案是新疆幾個區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所以經常飛新疆。從城鄉所畢業的陸生裡很少有人在大陸傳統的設計院工作，加上筆者對規劃院不了解，所以就開門見山問了不少相關的問題。

▲在西北邊境的新疆塔城地區調研。

城 規劃院有多忙?

張 像我剛工作的時候，最忙的時候，加上出差，可能連續一個月不休息，一般週末可以睡到下午，再去公司加班一下。現在工作幾年後，一周至少休息一到兩天吧，忙歸忙。

城 按照這個工作強度，團隊裡男生比例會不會更多啊?

張 其實大陸的幾大院裡面，除了中規院、廣州規劃院男生比較多之外，其他的男女員工比例基本接近一比一。以前可能男生會多一點，現在基本都要打平的。現在大學規劃專業的男女生佔比也是如此，加上出來就業，很多男生沒有選擇規劃設計工作的話，可能女生在這個領域的佔比更高些。

城 我們事先向同學徵集了問題，有同學對畢業之後去大城市還是小城市，找工作還是生孩子這個問題略糾結，想問問你怎麼看?

張 擔心這麼多幹嘛呢? 是不是? 生完後你去找工作，不管你大城市小城市，現實就是人家覺得你孩子都生了，接下去可以穩定工作了。你要是來工作，管你大城市小城市，來了就想生孩子，就想休產假，那大公司肯定不想要啊。

城 聽說你兩年就畢業了，是怎麼做到的?

張 其實我上學就比一般人晚一點，不想在學業上拖太久。如果你一畢業就快三十歲了，那後面其實蠻難打拼的。

我本來是打算兩年半才畢業，兩年畢業，時間太緊，學分排不過來。我學習到一年半的時候，清明節回來就想說，反正也得找工作，然後校招我們又沒有參加，就去現在所在的公司實習，因為以前有師兄師姐在這個公司。實習完後，我們領導就說想讓我留下，問我今年能不能畢業，今年馬上就來工作。那時候五月份，最好七月或者八月就來。我說，爭取看看能不能這麼快。

我答辯的時候，已經是那年答辯的最後一周了。我第一次申請答辯的那天遇上颱風，後面就只剩下兩天，然後又延遲了一天。如果再遲一天，就不能算是那個學期畢業。

城 寫論文花了多久?

張 大概一年吧。八九個月。碩一暑假我已經在想論文要寫什麼了，開始有一些方向，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在開始分導師了嘛。最開始的方案是做自己本科研究的方向，研究金門，可以在《地理科學進展》[1] 刊物上找到我發的期刊文章。本來想找老王當導師，但是老王覺得那個方向找他不合適，後來到張聖琳老師那邊，就轉做了自己老家的研究，那時候沒想著就業的事情，就想著你做的研究是不是你所喜歡的，有沒有意義。

城 論文要不要和未來就業方向做銜接呢?

張 這點你就可以學學謝澤星，他研究高鐵仕紳化之類，這種對未來工作就很有幫助，像我的研究就是興趣一下。而且如果你研究如果沒有做得那麼深，自己還沒弄懂，看起來就會有點雞肋，你去工作的時候會被貼標籤。

城 在深規院主要做過哪些項目啊?

張 最開始做過《金華 2049 年戰略研究》，謀劃金華市在 2049 年的產業、公共服務、城市魅力、或者影響力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和你們看的《紐約 2050》、《上海 2049》研究比較像，只不過它是針對金華這個地方而言。另外還跟過天水市、永康市、潛江市、獨山子區的城市總體規劃。

最近大陸的一個規劃方面的變革是，原來的城市總體規劃、土地總體規劃、主體功能區規劃，所有跟空間有關的規劃，現在全部變

1 张和强，& 刘云刚 . (2017). 金门的边界身份认同初探 . 地理科学进展，36(12), 1521-1530.

成一個規劃，叫做國土空間規劃。我們也做了一些研究，今年年初也發了一篇文章，主要是在梳理臺灣國土空間規劃的演變。

我現在一直在從事的專案是新疆塔城地區、喀什地區和兵團第九師的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所有會經常飛新疆。

城 專案組規模會有多大?

張 像我們一個地級市的規劃，可能會涉及到四五十人。縣級市的規劃，專業統籌下來可能會有十幾人。真正一直在跟項目的，做整體把握的是上面的老總，加下面兩三個人。

城 經常出差嗎?

張 項目到哪就到哪。今年受疫情影響，也是一年飛個三四次。這是今年的第三次，待半個月左右。看階段，有時候全面調研的時候會去二三十天。如果是溝通彙報或者其他的階段工作的話，可能就去個一周。涉及到現場調查的，基本都是半個月以上。

城 為什麼會想到去規劃院工作?

張 就是契機。之前想說先回來實習看看，領導也挺喜歡的，叫我來，想說先做一下。也有人會覺得我肯定不太適合這種規劃工作，因為平時也是比較自由，比較有自己的想法，不太適合這種相對為政府服務的工作，所以很多人覺得我應該做完兩三個月可能就走了，沒想到做著做著也做了三四年。

除了工作，最近我們一直在討論飛地經濟的事情，在做深汕特別合作區的事情。抽空會寫寫之前做的一些總規的思考。沒想很多，每天就很忙。

▲在帕米爾高原金草灘國家濕地。

城 想知道城鄉所對你的影響，特別是作為體制內就業者，城鄉所的理念在體制內有無浸入的可能性？

張 你要有多元的視野和心態，同時也要有自己的立場。這很重要。像柏霆、煜龍，他們都還沒畢業，也都是我同學，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狀態，享受其中。像潤琳、光曄，他們有的在學校，有的去公司尋找一些能夠做社區營造的可能性，我覺得也挺好的。從城鄉所畢業的這些陸生，真正待在規劃院的不多，澤星之前是在浙大院，後來又轉去房地產，真正一直待在傳統幾大規劃院的，好像只有我吧，比較特殊。

在這種工作中，你需要為政府的決策做支撐，在你的論證和想法不是很強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其實是在為他們的決策尋找論據。只能證明它 OK，要去找證明它可以實現的手段，比較技術官僚，這就是待在大陸規劃院會遇到的問題。可能在城鄉所的理論裡面，這會是一種背叛，有些時候會讓很多人選擇放棄。

但如果要談城鄉所的理念在體制內浸入的可能性的話，我想說的是，其實你最終要面對的就是一塊土地，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只是在不同體制、不同階段、不同城市，你的處理方式可能會不一樣，但核心理念不變，還是空間公平、空間正義。舉個例子，總會有人先去動這個空間的，隨之而來衍生出很多矛盾。這個過程中，有的做法是等空間動完之後再去解決動空間之後帶來的矛盾，有的則是人們對這個空間有自己的設想，想要在動工過程中先去解決問題。

城 怎麼看待在大陸做城鄉所一直倡導的參與式規劃？

張 大陸現在在規劃政策層面總體比較自上而下，如果參與沒有得到政策支持的話，實際上居民的動力也是不足的。總的來說，做參與式規劃的環境還沒有形成，除了體制問題，可能還是階段問題。像臺灣有諸如社區規劃民起來，就可以申請項目，慢慢參與式規劃的生態就逐漸產生了。

就像你創業，你只要想法起來，你通過融資手段，你有天使基金，這條通路是存在的話，就會有人去走這條路。但如果不存在，就很多人不幹。就像你創業在北上廣深，就容易實現變大，在你的小城市，就變不大，其中一種原因，就是它的環境和他的通路都不一樣。

所以所謂的參與，只能是不同模式下的參與，也不是為了參與而參與，而是你做這個參與到底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比如這個社區它不拆遷也不幹嘛，但是就只有老年人，你覺得他們生活不好，照顧也不好，你要解決的是這個問題，還是說，人家原來生活的也挺好的，種種菜園子，鄉下人就這樣，然後你的參與只是為了參與。大陸有部分參與其實就是在幫旅遊公司搞旅遊開發，這種就是很功利的參與，所以要看你的目的是什麼了。如果說，沒有目的，只是說要去做社區參與，那我覺得沒必要。

聯合居民把村貌村史弄起來，這也是一直參與。就像潤琳他們做的廣州泮塘五約項目，就是帶動在地老人做居住區的歷史環境復原，以及非遺舞獅文化的再現，我們看到在地文化有在慢慢活起來，居民可以更開心地生活，這些都能被看見。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老年照護。設計參與達到這個程度也可以。如果這個過程有資金來促進，就更好，否則這個過程肯定是很困難的。

但是實際上你應該認識到，資金的進來是人心最容易渙散的時候，人的那些私欲什麼的都上來了。這是在社區規劃中非常忌諱的一點。資金如何來，如何用，這個度要怎麼把握，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城 不知道大家畢業之後會不會想去規劃院，作為資深規劃院工作人士了，講講進規劃院的要求？非規劃專業者有沒有可能去規劃院呢？

張 你需要有一項很突出的能力，要麼研究能力，要麼設計能力，然後就是能夠接受高強度的工作。雖然沒有很公平的考核方式，但是你要讓人看到你有亮點，你需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我手下經常有實習生，因為我在做一個縣，它是做黃金產業的，那我就希望他告訴我這個黃金產業現在怎麼樣，世界上這種挖黃金、做黃金的地方是什麼樣子的，你能去總結去挖掘，然後告訴我，未來這個縣的黃金產業有什麼發展方向，能不能給現有公司帶來新的可能，或者我需要再增加什麼樣的空間把產業做活。還是你告訴我，黃金不適合做。我只需要你把這個問題講精彩，我就覺得你可以用。但是你這一整套分析問題的邏輯都做不出來的話，那我就覺得我不能用你。

也就是說，設計不是硬性要求。當然，如果你覺得你設計做得不錯，那我就給你這個中心城區他面臨的各種問題，你去出方案、出設計，也可以。這方面如果你做得很精彩，能說服大家，也一樣。但是，能力就是存在於你對這些細節的思考，比如國省道要不要外遷，關於民族的東西要怎麼融合，特色要怎麼做，你都能講得頭頭是道，都能有新的方案出來，那也一樣。這就是考驗人的能力的，不管你做研究，還是做設計。

城 你想問城鄉所的老師或其他同學什麼問題？我們可以代為轉達。

張 問問題的話，我現在很好奇，老王陸陸續續也收了很多陸生，他自己帶陸生的情況下，通過培養這些陸生，他希望這些陸生是什麼樣子的？

他一直在做規劃設計史的教學工作，一直在討論規劃。他對於這一幫來自大陸的學生，或者在這種體制下，可能像我剛剛說的，會面對很多規劃中的無奈，去給政府做政策支持。當然，做政策支持，在臺灣也是會的，比如現在的南向戰略，說來也是一樣的。所以想知道，他希望這些陸生應該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與在大陸或者去歐美念書的同學有什麼不一樣？我蠻好奇這一點的，因為所有陸生上他的課最多，他也帶了好幾個陸生做導師。

陸生都還蠻想選老王，當時我也想選老王，就這個問題，問問其他陸生，也是蠻有趣的。我去上學前，其實一開始是衝著小畢去的，他寫的東西蠻有趣的。

（訪談後，我們將此問題轉達給王志弘老師。以下是老師對此的回復。）

王 這很簡單啊，不管本地生、陸生、僑生、外籍生，都一樣，沒有特別的地域差異。就是希望學生可以成為思慮周密，又讓人感覺溫暖的人，還能在逆境中保有平常心。思慮周密是教學目標，但這多少會讓人覺得嚴肅，所以要補上感覺溫暖。給很多作業，就是稍微模擬一下逆境。至於規劃的問題，我其實不做規劃。規劃設計史教的是思慮周密。至於該怎麼辦（在不同地方做規劃或其他事情該怎麼辦），早就有答案了：啟蒙、組織、動員、抗爭；社會分析、價值澄清、政治協商、建立制度。

▲與塔什庫爾幹縣縣委書記討論。

後疫情時代 時間 Life

2020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攝影大賽

疫情的風暴，吹亂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節奏。人們日常生活方式也為此有了轉變。後疫情時代，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該如何對話？本次大賽我們徵求空間、社會議題、自然環境、文化等等的攝影作品，以體現後疫情時代的日常。

徵件對象：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職師生

競賽方式：

大賽分為單張照片組(一人至多投稿三張)、四張照片連作組（一人至多投稿二組圖），一人可兩組別皆投稿。

競賽評比方式為評審、大眾評分，評審團為主辦單位特邀之本所教師；大眾評分方式為主辦單位將攝影作品(不顯示投稿者姓名）統一輸出排版張貼於城鄉所空間(位置另行公布)，城鄉所辦公室將放置專用貼紙，供本所師生投票評分（大眾評分）。

繳交方式：

1. 每一位投稿者需填寫一份報名表、作品標籤（詳附件）。
2. 攝影作品之檔名格式請以姓名_學號_組別_順序編號與作品名稱編寫。
   ex：陳大貓_學號_單張照片組_01作品名稱；
   陳大貓_學號_四張照片連作組_01作品名稱
3. 報名表與作品標籤之檔名請以姓名_學號編寫。
4. 作品格式統一為JPG或TIFF檔案。
5. 請將報名表與作品標籤、攝影作品壓縮成一個檔案，郵寄至 meyayoung502@gmail.com。

2020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攝影大賽大賽規章

掃描QRCODE下載大賽規章和報名表與作品標籤

徵件時間： 自2020年10月5日（一）至11月16日（一）台灣時間23:59止。
評審時間： 自2020年11月23日（一）至12月18日（五）止。
公布結果： 2020年12月21日（一）。
頒獎典禮： 僅訂於城鄉所尾牙活動中
報名費用： 免費

獎勵辦法：

(一)獎項規劃：
1. 單張照片組：金獎一名、銀獎一名、銅獎一名、優選若干名。
2. 四張照片連作組：金獎一名、銀獎一名。
3. 城鄉人氣獎一名。

(二)獎品規劃：
1. 單張照片組：金獎:1000元禮品、銀獎:700元禮品、銅獎:500元禮品、優選:300元禮品。
2. 四張照片連作組：金獎:1000元禮品、銀獎:700元禮品。
3. 城鄉人氣獎：300元禮品。
4. 備註：獎品皆為上述同值金額之禮品與獎狀。

評分標準：

評審依參賽攝影作品之主題契合、 構圖、創意觀點進行評分（60%）、大眾評分（40%）。

備註：

1. 不限制PS使用，可做照片合成與修圖。
2. 不限定使用之攝影器材。
3. 主辦單位保留一切檢驗作品、來源素材以確認其符合參賽規則的權利。

疫間

城鄉所攝影大賽-評選會

2021/01/14 (四)

11:00–13:00 工綜313

口罩、消毒水、小七排隊的社交距離，我們都處在這樣的日常裡。

從一開始恐懼不安惶惶終日，逐漸地，我們，乃至整個世界都已經開始習慣，將不安置入心靈的某一角，在噴酒精戴口罩時隱約浮現，而後繼續運轉生活。

十二個月瞬忽即逝，時間用殘酷或溫柔的力度，在每個人的眼睛與記憶裡，刻下截然不同的軌跡。

66 組照片，是恐懼、是憂傷、是昏暗的鏡頭與黑白色調，也是堅強、是體諒、是會心一笑與互相扶持的片段時光。相同的是，此時此刻，我們帶著與疫情共存的體悟，在同一個空間裡，繼續建構，並且珍惜，「日常」。

副教授
康旻杰

助理教授
林家暉

客座教授
侯志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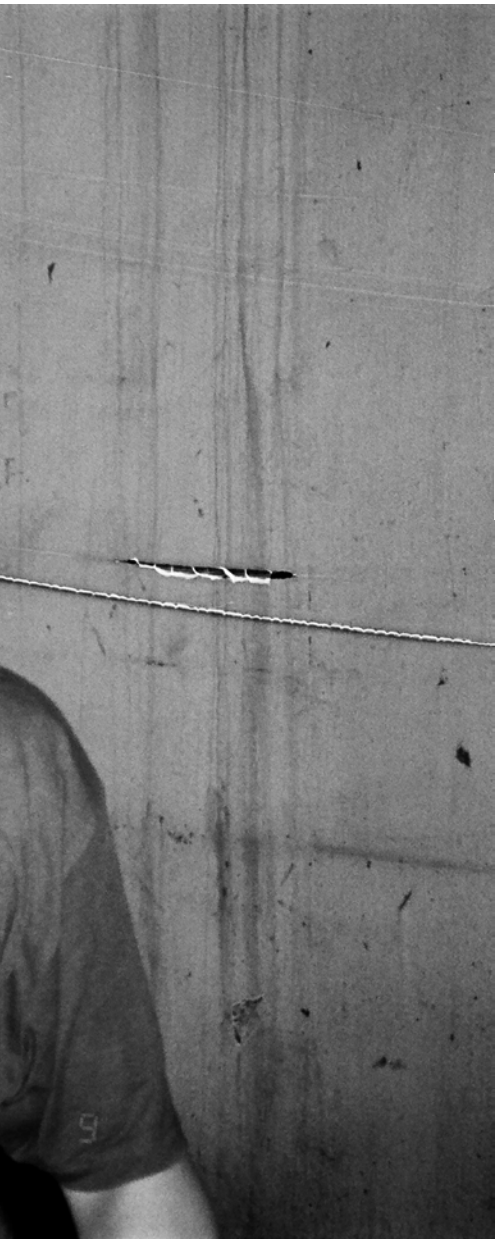
掃QRcode
填寫報名表

邀請本所三位老師擔任評審，評選會議將結合評論與評選，並開放師生前來旁聽。

頒獎典禮：2021 / 1 / 15 (五)
城鄉所尾牙活動中。

單張組 - 金獎 楊伯中 全副武裝

評語:
作者的創作意圖很直接又明顯，質感的噪點、光影對比、主角身上穿的閃電形狀的衣服等，都反映出動態、焦慮、諷刺或者其他的企圖。呈現一種介於刻意或無意間捕捉的感受。



後疫情時代的日常
2020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攝影大賽得獎作品收錄

主辦單位：建築與城鄉所學生會
評審委員：康旻杰老師 林家暉老師 侯志仁老師
評選日期：2021 年 1 月 14 日

疫情的風暴，吹亂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節奏，人們日常生活方式也為此有了轉變。後疫情時代，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該如何對話？本次大賽我們徵求空間、社會議題、自然環境、文化等等的攝影作品，以體現後疫情時代的日常。

文／城鄉所學生會

▲評選現場。

單張組 - 銀獎 楊伯中 停工停產

單張組 - 銅獎 賴彥安 鞭炮除瘟

評語：

在光線很好的條件下，正常工廠應該要開門，但是在作品中卻沒有，表現出後疫情日常的主題。關閉的大門口一個紅衣人站在春聯前，面戴著口罩，某種喜／福的狀態，在疫情下也顯得特別諷刺，可以讓人聯想到

單張組 - 優選 姚麗金 混飯

評語：

視覺焦點除了紅色的「飯」字之外，招租好像又反映出了蕭條，表現出疫情當下的日常被切斷之主題。但是這是一個文字符號，以攝影作品來說，符號在影像上的佔比有點過重。

創作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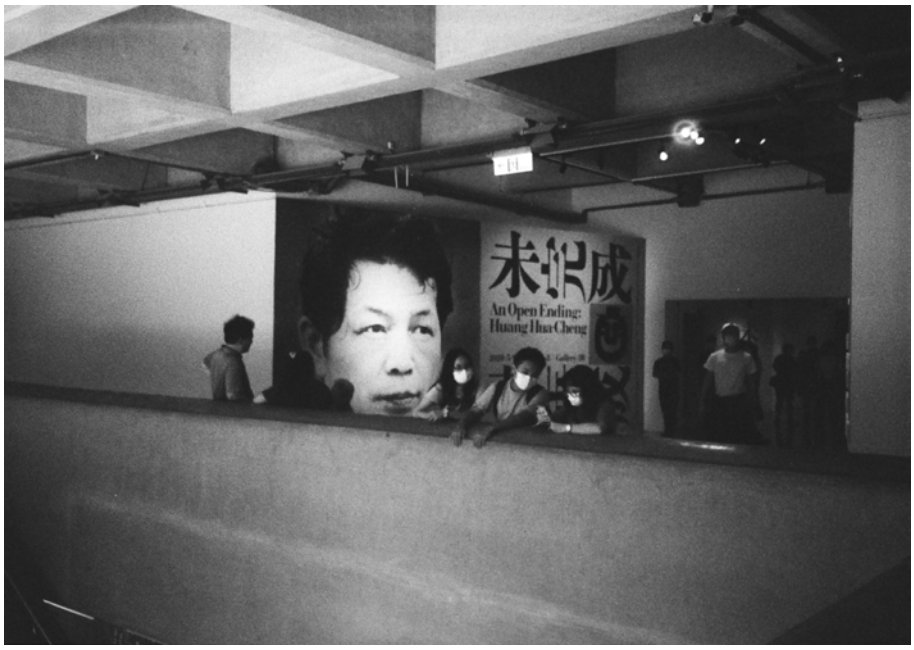
遇上新冠肺炎的夜弄土地公，眾人在鞭炮聲響與煙硝味中迷航。

拍攝地點：

台北社子島

評語：

攝影技巧很成熟，不過美感、色調、構圖都強過主題性，要透過文字才能理解表達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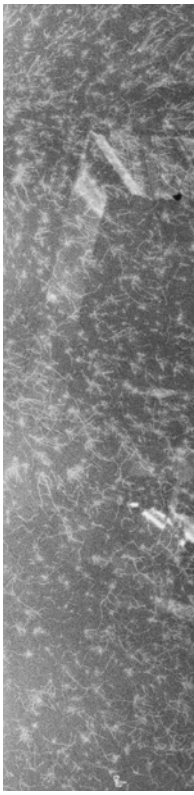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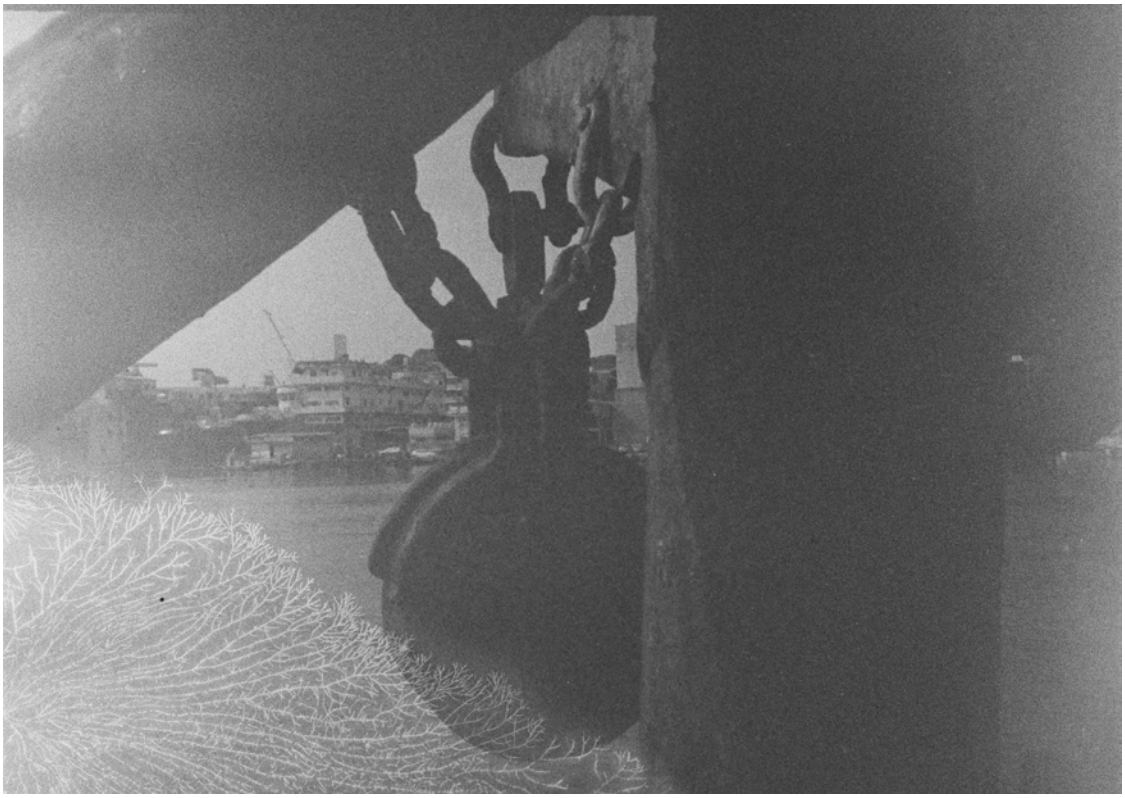
單張組 - 優選 陳柏豪 COVID-19 未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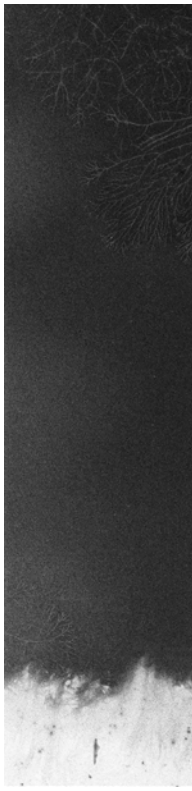
創作理念：抗疫未完成。

拍攝地點：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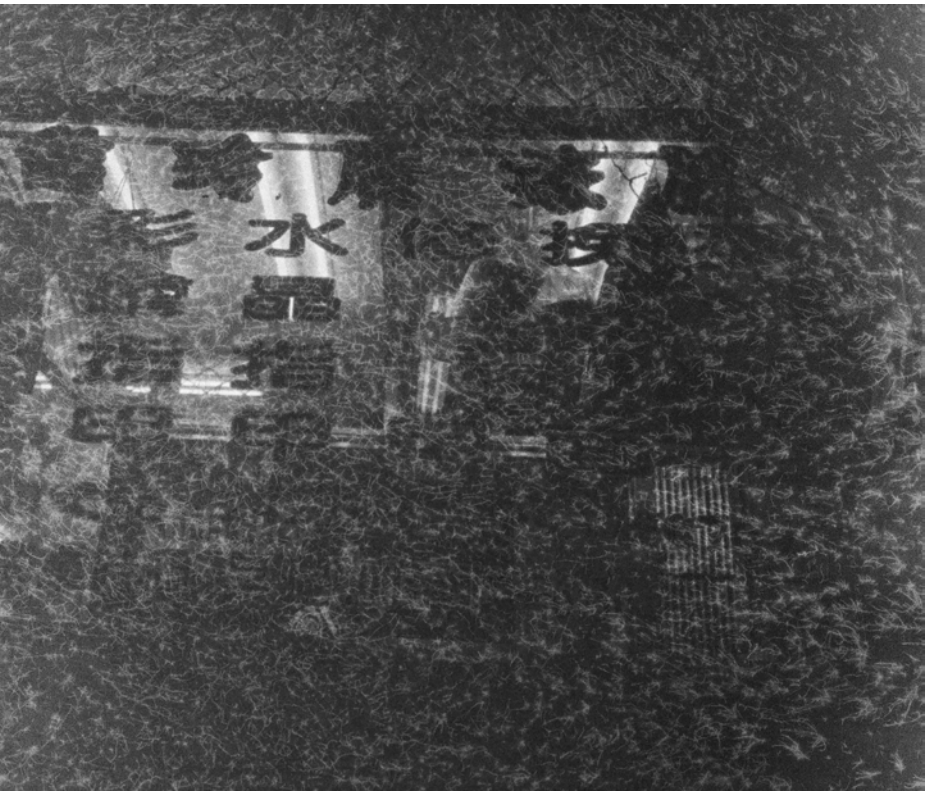
評語：題材有趣，但構圖掌握可以更好。







連作組 - 金獎 陳柏豪 生命之花



創作理念:

後疫情時代，台灣疫情看似趨緩，疫病與其帶來的種種，已如黴菌菌絲般隱隱根植於日常生活中，在那些灰暗的空間、進步文明的象徵之上，菌絲也像花，生命之花，即使刮去重寫，仍在空氣中留下綻開的氣味。

拍攝地點：基隆

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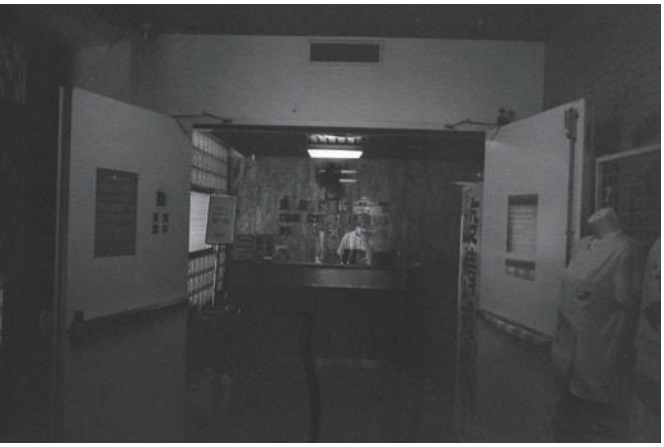
技巧與影像質感上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質感非常強烈，特殊的畫質好像隱含了什麼寓意。如果只是單張的話可不會特別引人注目，連在一起的安排讓影像開始有故事性。

創作理念:
父與子、
在逾越之後、
原色、
倚盼

評語:

構圖、色彩等各方面的攝影技巧都很成熟，使得影像品質佳。也把「景區在疫情之下才回到日常」的主題呈現得很到位。本次比賽大多數作品的焦點好像都放在城市，但是這組作品把關注放在鄉間，引人注意。

連作組 - 銀獎 董其樂 2020 年四月某天，我不是個景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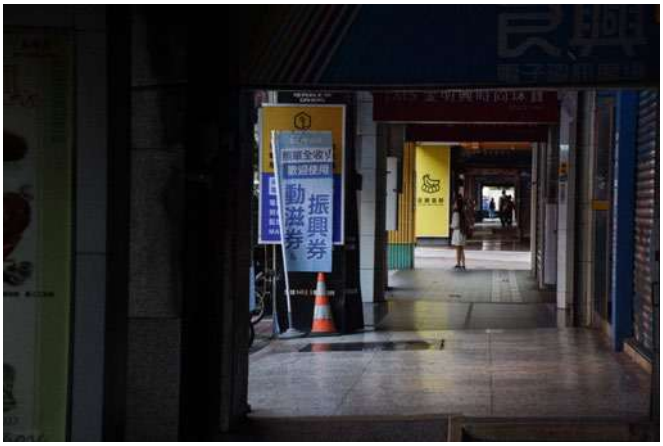


創作理念：
獨，處之泰然。

拍攝地點：台南／台北

評語：每張照片裡的日常，構成了完整的圖像。美感與景深的關係很優秀。

連作組－銅獎 陳柏豪 獨



創作理念:

現今疫情之下的台灣，好似可以如常地過，商業空間依舊營運著,活動依舊舉辦著。但事實上還是對有些人的生活造成影響，振興券、動資券或藝 fun 券督促著我們消費，拿在手裡是小確幸，卻也想著經濟的大課題。我想各行各業中一定有人正在積極扭轉劣勢，在困境中努力生活著，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前進。

拍攝地點：台北／新北

評語:

傳達出「看不見」的主題，社會雖然在持續運作，生活好像很正常，但疫情仍然存在，可能還是有很多人的困難是看不見的。但議題表達的手法可以再強烈一些，整體所呈現出的空間美感也比較沒有中心性。

連作組 - 優選 蕭珧綺 Struggle

▲攝影：楊伯中